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纪念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

□ 陈宇

1934 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历时两年，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 11 个省，于 1936 年 10 月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红军将士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他们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也是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100 年前，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基础上创建了黄埔军校。此后，一批批胸怀救国救民崇高理想的革命军人走出黄埔军校，走上了反帝反封建、促进国家统一的东征、北伐等战场，其中部分黄埔师生秉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走完了长征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黄埔精神和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都是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必须牢牢坚守的精神底色。现在，我们正行进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这是一场接力跑，需要包括黄埔同学、亲属及黄埔研究者和工作者在内的黄埔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的贺信中的殷殷嘱托：“不忘黄埔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红军长征概述

□ 陈宇

1934—1936 年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红 25 军陆续撤离原各革命根据地，从长江南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红军转战 15 省市，最远行程 25000 余里，四路红军合计行程约 65000 里，历时两年，在陕北实现大会师。

红 6 军团拉开长征序幕。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1934 年 7 月初以红 7 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先遣队转战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抗日主张，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根据地压力的目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于 7 月 23 日命令红 6 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在湘西活动的红 3 军（1931 年由红 2



/ 展览馆中的毛泽东、周恩来苟坝会议之夜雕塑。

军团改编）取得联系，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1934 年 8 月 7 日，红 6 军团突围西移，10 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 3 军（后恢复红 2 军团番号）会师。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1934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到湘西与红 2、红 6 军团会合。10 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 5 个

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 8.6 万余人，从瑞金、古城、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 24 师和地方部队共 1.6 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0 月 21 日晚，中央红军从于都县城西南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至 11 月 15 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11 月 25 日，中央红军分 4 个纵队，



/ 百石村村口的长征第一次胜仗图。

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一部渡过湘江。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

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制定了红军此

后的战略方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初，中共中央在滇东北威信县扎西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3月12日，苟坝会议上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

再入川南。红军突然转向东北，21日四渡赤水河，折回黔北。31日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27日抵昆明附近，5月9日从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巩固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党和全军的思想。

强渡大渡河。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



/ 泸定桥。

陕苏区)活动,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向西转移。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5月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1团18名

勇士乘船强渡成功。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和先头部队红4团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兼程急进,29日下午夺取泸定桥。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中央红军占领天全,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翻越夹金山北进达维途

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尽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



/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红25军长征。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25军

和鄂豫皖省委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2月底，红25军激战独树镇，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取得了庾家河反击战的胜利，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开辟了鄂豫陕边根据地。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北出终南

山，过陇东。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7月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入甘肃，占两当，血战四坡村。9月16日在永坪镇与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到陕甘。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指示，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1935年9月10日，毛泽东等率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后组

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7日拂晓,一举夺取天险腊子口,入甘南,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先期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同红15军团会师。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陕北奠定了基础。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1935年10月8日—20日,南下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百丈地区同川军10多个旅激战7昼夜,歼川军1.5万余人,红军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西移,4月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三个方面军陕北大大会师。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



/ 遵义会议的会议室。

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盘县、亦资孔地区。朱德、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原红9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主要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

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

长征中的主要战役和战斗。红一方面军:湘江战役、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直罗镇战役。红二方面军: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转战湘黔滇、乌蒙山回旋战、陇南进攻战斗。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千佛山战斗、毛儿盖战斗、包座战斗、绥崇丹懋进攻战役、天芦名雅邛大进攻战役、岷洮西进攻战役。红25军:独树镇战斗、庾家河战斗、袁家沟口战斗、四坡村战斗。■

红军长征中的黄埔师生

□ 陈宇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从江西瑞金出发，最终到达陕北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精神和意志的考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近20万红军踏上长征路，最后仅有约5.3万红军在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其中，有近百位知名的黄埔师生参加了长征。他们在长征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和贡献对于长征的胜利具有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本文仅介绍其中的一部分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1924年9月回国，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东征途中，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1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

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5年1月贵州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2师参谋长。受廖仲恺邀请，参加创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2师师长。1927年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促成南昌起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副总指挥。1928年冬，赴苏联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长征开始时，叶剑英任军委第1



/ 红军长征开始前的宣传画。

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国民党飞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3月，任红3军团参谋长。7月，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脱离险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在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9月回国，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1年1月，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同年底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1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任红1军团政委。长征时和林彪指挥红1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抢占九峰山，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1935年1月，指挥红1师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主张。5月，任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乘胜占领哈达铺，偶然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根据地，并把这喜讯急告毛泽东。10月，率先遣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率

部参加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1月，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8月，回国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由黄埔1期生蒋先云等主持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会刊《中国军人》杂志，李富春是主要撰稿人。10月10日第7期刊登有《本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中李富春同志之政治报告》。1926年4月初，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宣布反共“清党”，蒋先云等退出黄埔军校后，曾到李富春在广州负责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授课。北伐战争中，李富春任北伐军第2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1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未愈，中共中央调李富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



/ 红军强渡大渡河使用的木船。

“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3军团政委等，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陈奇涵（1897—1981），江西兴国人。15岁入赣州中学，22岁考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次年转入广州护国第2军讲武堂学习。历任赣军排长、连长、

代营长。1924年因不满军阀混战而脱离赣军，投奔广东革命政府，任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初到黄埔军校任教，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黄埔学生队两次东征，历任学生队队长、连长、少校政治大队长。1928年后，陈奇涵先后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赣西南红军学校第三分校教育长、赣西南特委军委参谋长兼南路纵队政委、红3军教导团团长、红4军参谋长、红1

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途中，任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陕甘支队第1纵队教导队队长等职。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红15军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参加东征西征战役。

毕士悌（1898—1936），朝鲜平安北道人。1919年春秘密到中国。1920年底，由吉林到上海，1921年6月到昆明，以“华侨”身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6期炮科。1924年初毕



/ 吴起镇会师门。

业。1925年初，到黄埔军校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后任第3期学生队第4队上尉队长、中校技术教官。长征时任干部团参谋长，协助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指挥干部团英勇奋战，完成了警卫遵义会议的任务。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参与指挥干部团攻打土城青杠坡的作战，并亲自率队冲锋陷阵。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他和干部团全体指战员一日行军100多里，配合主力取得了遵义大捷。渡过金沙江后，他率干部团一部以

猛烈的火力一举攻占狮子山隘口，参与指挥了寒扑岭——把伞梁子战斗，进占通安州，从而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对干部团特予以通令嘉奖。与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干部团改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他仍任参谋长。此后，毕士梯随部队过天险腊子口，突破守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随后到红15军团任第75师参谋长，参

与指挥所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雷经天(1904—1959)，广西南宁人。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传奇的革命家。他3次亲历起义，3次被冤枉开除党籍，但始终保持革命信仰。1919年，他15岁即是五四运动时南宁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入党后的次年初，党组织派他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入伍生团党代表秘书、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6年7月，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以

叶挺第11军第24师第60团党代表之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2月，以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之职，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12月，以广西省农会筹备处主任委员之职发动百色起义。1931年冬，第三次被冤枉开除党籍。长征路上，雷经天先当文书，再当侦察员，后来当伙夫，背着大铁锅和部队跋山涉水。路过广西时，有战友老乡劝他：“甩掉‘黑锅’，回广西去，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他却平静地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黑锅’是放下了，但因我受牵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过雪山时，他身体垮了，倒在雪地里起不来，他对老战友覃士冕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离开队伍。党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老战友莫文骅正好路过，看见栽倒在雪地里的雷经天，给了他两块生姜擦身，他擦后竟然奇迹般地爬了起来，跟上队伍翻过雪山。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粮食部秘书科科长。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留校在第3期入伍生第1营任副排长。1925年春东征时任排长。1927年3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队长。率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和广州起义。1931年7月任红4军军长，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扩大了鄂豫皖苏区，使红四方面军逐步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指挥部队发起嘉陵江战役。6月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8月在毛儿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在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周士第（1900—1979），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五四运动中被选为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干事。1923年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琼崖评论社”。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参与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起，任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率队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军阀叛乱等。1925年11月，任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

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1926年4月，任独立团参谋长，5月随部作为北伐先遣队进军湖南。8月参与指挥汀泗桥战役、贺胜桥等战斗，率部攻打武昌城。1927年4月，率部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辗转香港、南京、上海等地，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参与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活动。1933年，到蔡廷锴第19路军参加反蒋活动，任第49师参谋处长、团长。后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长征期间，任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指挥科科长、队长。1935年9月上旬，率上干队进入川甘交界的嘉陵江上游铁布沟（白龙江），他拉着骡子在半山腰的栈道上探路，不慎跌进江中。在家乡琼海九曲江练就的好水性，让他死里逃生。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冯达飞（1899—1942），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入莫斯科高级航空学校及陆军大学深造，

毕业后转赴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组学习。回国后参加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任红7军2纵队第2营营长、纵队司令员。1931年秋，红7军和中央红军汇合，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独立师师长、红8军代理军长、湘赣军区参谋长。1932年4月，红军在漳州缴获国民党军两架飞机，其中一架修好可使用，命名为“马克思”号，冯达飞奉命检修飞机，并飞回瑞金。他是中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第一个飞行教官。长征出发时，冯达飞编入干部团，任地方干部科科长，对地方干部进行军事培训。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冯达飞任红军大学炮兵科科长。

彭明治（1905—1993），湖南常宁人。1924年3月，到广东，后入黄埔军校1期军士教导队（教导团教导大队）学习。1925年在汕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第73团代理连长，随军南下广东。三河坝战役中，彭明治左腿受伤昏迷。醒来时，部队已经离开，只好寄居在附近百姓家中边养伤边打听部队的情况。1930年，找到红3军，担任政治部警卫连排长，并重新

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先后任红1师第2团参谋长、第3团参谋长、代理团长、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3大队参谋长。所部作为先头部队，抢占乌江渡口渡江时，被国民党军击退，彭明治灵机一动，乘竹筏顺江而下，最后找到渡口渡过乌江，保证了后续部队渡江成功。到达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第73团3营7连连长、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任红4军第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成为能征善战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长征开始时，任红1军团军团长，担任全军前卫，掩护红军主力，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等作战。

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黄应龙（1906—1935），湖北黄梅人。武昌启黄中学毕业，1925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党组织推荐到广州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1929年7月，任阳（新）大（冶）手枪游击队副队长。不久游击队整编，任红12军纵队长。1930年3月，任红8军卫生部附属医院政委，后任红3军团卫生部政委。1934年10月，随红3军团参加长征。12月攻克贵州黎平后，部队进行整编，被任命为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即干部休养连指导员。1935年5月，任冕宁抗捐军总司令，几天内发展抗捐军上千人，后编成50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红军主力部队过完彝族地区后，黄应龙率领抗捐军就地打游击，计划与红军干部刘彬、方忠率领的100多位红军战士组建的游击队配合行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遭到当地反动武装的袭击，红军游击队解体，黄应龙被捕，最后在成都英勇就义。

郭化若（1904—1995），福建闽侯人。黄埔军校第4期炮兵科毕业，任黄埔军校代区队



/ 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凤凰嘴渡口。

长。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时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蒋介石曾两次下令调郭化若当秘书，都被他以“军人应当效命疆场”为托词予以坚决回绝。毕业后任黄埔军校炮兵科第2队代理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任炮兵连连长。1927年9月，他在三河坝赶上了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朱德领导下转战粤闽赣边境。同年冬到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次年回国，任红4军第2纵队参谋长、红4军参谋处处长、红1军团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长征期间，郭化若任干部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每当

别人宿营休息时，他却忙着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次日的行军路线，工作量很大。出发时，郭化若脚后跟有伤，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稍有好转。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但他由于脚后跟长期溃疡，深有感触地说“我只能全靠一颗心”。

袁国平（1905—1941），湖南邵东人。早年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4队队长、第11军宣传科科长。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3月，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1930年6月，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8月，代表红3军团从湖南浏阳前往江西万载地

区，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1军团取得联系。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此后，袁国平先后担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8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等职，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国民党第19路军的谈判，获得二级红星奖章。长征期间，先后担任中革军委第2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到陕北后，他奉命创办红军学校，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三科政委、抗大二分校校长兼政委等职。

曾希圣（1902—1968），湖南资兴人，曾中生之弟。1925年

1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3个月后因病退学，后进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1927年七一五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秘密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调汉口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同年冬，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1931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次年，参与创建军委二局，任局长。长征中，他领导的二局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密码，与王铮并称为中共隐蔽战线枢纽机关的“谍报双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称：“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唐天际（1904—1989），湖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他任红3团第5师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会委员。湘江战役中，第5师奉命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指挥部队急行军抢占阻击阵地，与参谋长胡浚、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一起根据地地形认真研究部署兵力。

战斗残酷激烈，红军反复厮杀，一天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冲锋。第14团团团长黄冕昌中弹牺牲，政委毛国雄身负重伤。第5师第15团团团长和政委负重伤，3个营长牺牲了2个。师参谋长胡浚到第15团接替指挥，组织部队反击时牺牲。此役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第5师团、营、连干部几乎伤亡殆尽，3000多人的部队打得只剩1000多人，这也是唐天际一生中经历的最严峻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通道转入贵州大苗川。唐天际在这里发动群众，贯彻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苗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些苗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唐天际自幼酷爱书法，常以树枝为笔，沙地为纸，在艰苦的战斗岁月中仍练习不辍，后成为全国著名将军书法家。他说：“我的字有长进还得感谢长征。长征途中，我和宣传队员一起做宣传鼓动工作，用石灰水刷宣传标语。可以说是走一路刷一路，因此我写字也就出了名。”1937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完成的《二万五千里》书稿，收录有唐天际撰写的《湘南游击队》一文。

洪水（1908—1956），出生于越南河内。1924年，胡志明

号召越南爱国青年到广州来。洪水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于1925年到达广州，参加了胡志明主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毅然退出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洪水被王明以高级特务罪名开除出党。但他终不渝坚信马列主义，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和中国，而是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随朱德、刘伯承到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工作。由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支持朱德、刘伯承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张国焘将他在长征途中刚刚恢复的党籍再次开除，外加上顶“国际间谍”的帽子。洪水仍然跟着左路军多次爬雪山、三过草地，经历磨难。转战到西康甘孜一带时，部队被打散，他只身一人藏在藏民家里，后来靠放羊、放骆驼、沿路乞讨，北上寻找大部队，最后到达陕北。洪水是随红军走完长征路的几位外籍军人之一，更是唯一经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到抗日战争胜利全过程的外籍军人。

倪志亮（1900—1965），北

京市人。高小毕业后做杂货店学徒。1917年春，入皖系军队当兵，任班长、排长。1924年春入陕军第1混成旅炮兵营当文书。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毕业。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清党”，遭到拘禁。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被营救并参加起义。1928年初参加红军，先后任鄂东北红军游击队队长、游击支队支队长，红1军第1师第3团团长、红4军第11师第31团团长、第10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长征时期，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金川军区司令员、红四方面军步兵学校校长。

萧克(1907—2008)，湖南嘉禾人。1926年，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7年，在叶挺部第71团3连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任宜章县游击队队长并参加湘南起义，随后率部上井冈山编入红军第4军，先后担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1纵队参谋长等职。1929年，随

部进军赣南、闽西，并参加当地根据地创建。1930年6月后，历任红4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红8军军长、红6军团军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8月，率红6军团西征，转战贵州、云南等地，与贺龙所率红2军团会合，随后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1936年7月，红2、红6军团达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2、红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两个月后，代替生病的王树声出任红四方面军红31军军长，与胡宗南部交战，并同主力北上抵达陕北。

曾中生(1900—1935)，湖南资兴人。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4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3年9月，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

捕曾中生，对他实行监禁。曾中生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坚决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曾中生是戴着手铐脚镣走上长征路的红军高级将领，但他的革命信念始终未变，继续坚持同张国焘进行斗争。1935年8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年仅35岁。

张震球(1907—1974)，广西玉林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6月以化名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有说第5期)。随干部团上干队参加长征，历经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等战役。1935年2月，调任干部团3营主任教员，协助林芳英营长、罗贵波政委工作。后随3营巧渡金沙江、围攻会理城、强渡大渡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毛儿盖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辖特科团。张震球任特科团骑兵科政治教员，协助科长苏进率骑兵部队(科)边训练边作战，担负起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任务。在通渭城战斗中，张震球和苏进带领骑兵部队(科)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1922年就读于渭南赤水职业学校。1924年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 5 期政治科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4 月毕业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8 军第 3 师第 9 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干事兼 2 营政治指导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 3 营连长、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 2 营 6 连连长。三湾改编后改任团部参谋、副连长，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 年 10 月起，在红一方面军任师长、军长、广昌警备司令等职。1934 年 6 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长征期间，先后任中革军委第 2 野战纵队参谋长、红 3 军团第 4 师师长、红 10 团团长，指挥所部参加了夺取娄山关、攻占遵义城等战斗。1935 年 8 月，任红四方面军第 4 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

谭希林（1908—1970），湖南长沙人。1926 年 4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5 期工兵科。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后调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排长、副连长。1927 年 9 月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转战至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第 1 军 1 师连长，红 4 军副营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军长征开始时，任干部团特科营工兵主任、教员。征途中，谭希林充分发挥工兵技术特长，率部克服艰险，多次完成筑路架桥的艰巨任务。他带领工兵有时将桥架在水面下十几厘米，或者做几个大的结构，用夜晚架起、白天拆掉的方法，有效地规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强渡乌江时，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执行搭建浮桥的任务，谭希林和何涤宙奉调进行架桥技术指导。他们用竹笼装石头沉水代锚的方法搭成浮桥，红军主力部队从浮桥上通过乌江。毛泽东走过浮桥时，连声称赞：“真了不起，我们的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杨至成（1903—1967），贵州三穗人，侗族。7 岁读私塾，14 岁入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养蚕专业学习。1922 年，辗转云南、四川，后在重庆入川滇黔联军，任军需官。1925 年夏，随联军赴粤，参加北伐。1926 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 5 期。同年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后被派到由贺龙

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 3 师任连政治指导员。8 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连长，随部转战于闽粤赣湘边。在井冈山斗争反“会剿”时期，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1934 年 10 月，随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担负起打通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部队的重任。率工作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信息，做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筹集粮食、物资、弹药、药品等供给部队，使红军能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提供了物资保障。到陕北后，任军委采办处主任和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参加东征、西征战役。

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人。1922 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受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 5 期。参加广州起义，发动大冶兵暴。1931 年 4 月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红军团长、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1934 年 1 月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6 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 25 军军长。11 月，率领红

25军开始长征。1935年初到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委。7月，红25军西出甘肃，钳制国民党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9月，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政委。

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人。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后不久染上疟疾，住院半年多。因缺课太多，转入第6期继续学习。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4月，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进行反共“清党”。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被关进南石头惩戒场，后被判处1年徒刑。1929年4月，被释放后从香港到上海、武汉、长沙寻找党组织未果，返回家乡醴陵组织游击队，任萍醴边游击队队长、湘东南第2纵队政委。1930年初，宋时轮重新入党，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所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6军，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红35军参谋长、独立第3师师长、红21军参谋长、中央苏区西方军参谋长等职。1934年初春，宋时轮到瑞金红军大学任第2大队大队长，后到上级参谋科学习，不久调任上级



/ 遵义邓萍墓前的邓萍塑像。

指挥科的军事教员。红军长征出发前，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宋时轮仍任军事教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宋时轮出任红15军团作战科长。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1921年入南充中学。1926年到成都入实业专修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1927年5月，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战斗。1928年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2月，到闽西参与组建并训练地方武装。5月，任闽西红军第59团

参谋长。6月，所部编入红4军，先后任第2、第4纵队支队党代表，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红4军第11师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及乐安宜黄、建黎泰、金资等战役，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长征途中，任先遣队参谋长，参与指挥突破乌江、遵义战役、强渡大渡河战斗。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萍（1908—1935），四川自贡人。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彭德怀任团长的第1团从事兵运工作。

1928年7月，与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任红5军参谋长、中共红5军军委书记。同年冬，与彭、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1930年6月，参与指挥红3军团参加长沙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3年7月，兼任红军东方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所部入闽作战。期间曾兼任红5军随营学校教育长，参与筹建红军学校，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长征开始时，任红3军团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担任右路前卫，掩护主力突围。1935年2月，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后追击残敌，他亲临前线指挥侦察时在遵义英勇牺牲。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陈伯钧(1910—1974)，四川达县人。13岁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第1大队学习。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因作战勇敢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长征开始时，任红5军团第13师师长，负责掩护

中央纵队行动。12月，调任红5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多次打退国民党军追击，被誉为“铁屁股”。1935年7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9月，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主任教员。1936年2月，任红4军参谋长。7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10月，率部到达陕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周越华(1904—1977)，湖北广济人。贺诚中将的夫人。1925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师，正值国共合作，大革命处于高潮，她投身革命，参加湖北省妇女协会任特派员，宣传革命极为活跃。1926年11月，她从武汉回乡，在广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前往武汉，决意从军，于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做过战地救护，在上海和武汉从事地下工作时开过医院，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第三兵站医院、红军卫校工作。长征中，她担任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并协助贺诚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员，出色完成了组

织交给的任务。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越华被编入左路军。她多次翻越大雪山，三次过草地，经受了考验，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党的危急关头，她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拥护、支持朱德等同张国焘作斗争。

郭天氏(1905—1970)，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在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随黄埔军校特务营参加广州起义。后来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排长，工农革命军第2师副连长，红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支队长，红8师参谋长，独立第6师师长，第62师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9军团参谋长等职。长征中，他以军团参谋长之职协助军团长罗炳辉指挥红9军团单独行动，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牵制国民党军，多次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浴血奋战，先后取得老木孔、猫场等战斗的胜利，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任务。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所部改称第32军并编入左路军。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撤销军团参谋长职务，调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育科科长。■

黄埔师生在长征中的名人名事

□ 陈宇

90年前，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凭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和豪情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最终赢得胜利，为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也有很多黄埔师生，知名或者不知名，都成为长征队伍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如今，斯人已逝，这些黄埔师生的长征故事永远流传，他们的长征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再次重温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以此缅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的黄埔革命先烈！

成仿吾：参加万里长征的唯一一位大学教授

1897年8月，成仿吾出生于湖南新化县知方团（今琅塘乡）澧溪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1926年3月，成仿吾到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

长征出发时，成仿吾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同行。

他拿了一杆新发的红缨枪当拐杖，还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的挂包。挂包里除了放些日用品、衣服外，主要是中央党校的马列经典书籍，其中有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是他平生最珍爱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先后3次（1929年、1938年、1974年）将《宣言》翻译成中文，充分体现了他对这本书的深厚感情。组织上还派了一个挑夫，挑着他 and 党校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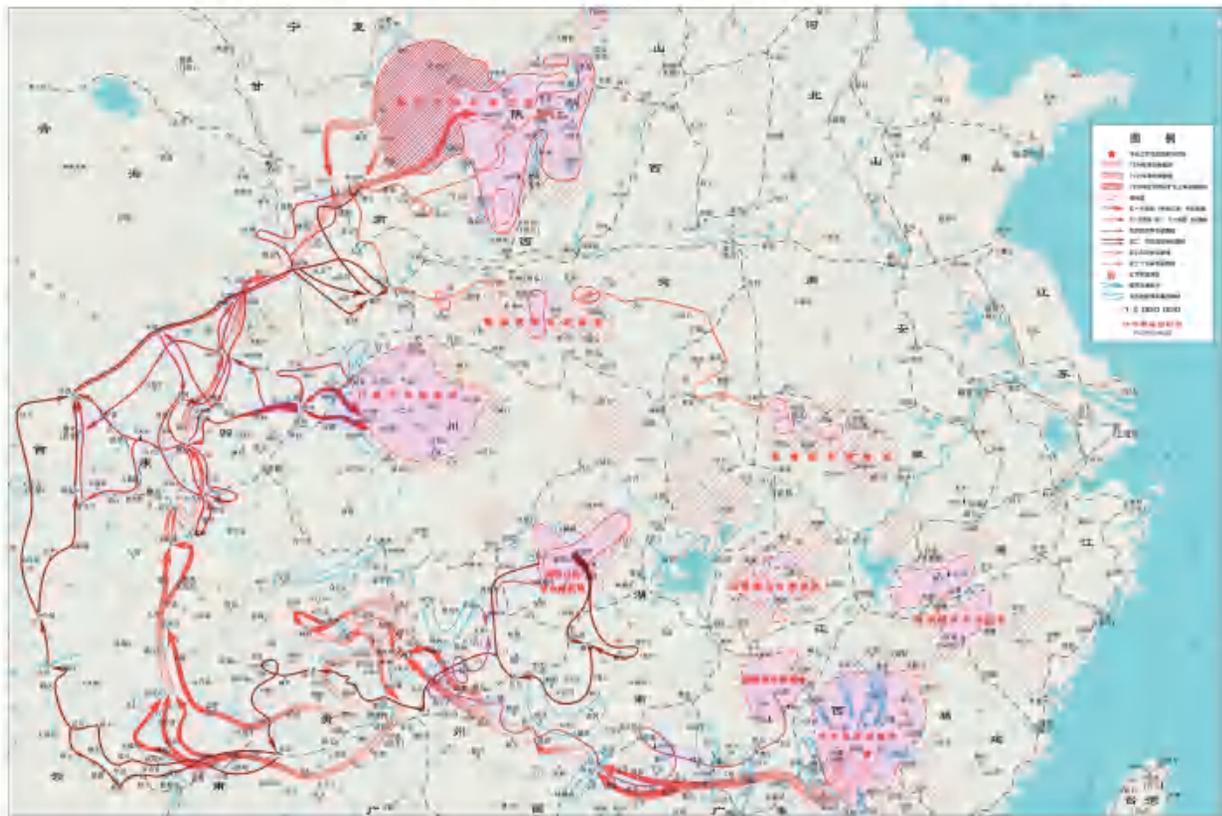
懋功会师后，成仿吾随红

军右路军过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历程。一天傍晚，部队在草地里宿营，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大家围着篝火煮食、烤衣、取暖，许多人说笑话讲故事唱歌，一时间白天的疲劳和饥饿消去不少。待到子夜时分，篝火相续熄灭，人们渐渐入睡，唯有一堆篝火还在燃烧着。毛泽东、彭德怀等都来到这堆篝火旁。他们穿着与士兵一样的军服，将手中提着的包袱往地上一丢，就当作垫子坐下来了。成仿吾也拄着一根拐杖靠过来凑热闹。他也与战士



/ 红军走过的草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全图 (1934.10—1936.10)



/ 红军长征路线全图。

一样的打扮，腰里还系着一根皮带，背上背着干粮袋，他将一块油布铺在地上，在篝火旁坐下。为了驱散大家的倦意，彭德怀拉开大嗓门，提议说：“请毛主席讲个故事。好吗？”大家一听，都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在闪动的火光中，毛泽东讲了几年来经历的红军作战经验。当他讲完后，便立刻大声提议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大家又

热烈地鼓起掌来。成仿吾也不推辞，便讲他早年留学日本，大革命失败后留学德国，主编《赤光》杂志的经过；讲他五四运动爆发后与郭沫若等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学习写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的经过；讲他原先是学习机械工程的，以后学无所用，又转学文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忘掉了疲劳和寒冷，

度过了这草地寂寞的深夜。

万里征程，道路崎岖。有一天，成仿吾邂逅老朋友张闻天，张闻天见他背着鼓鼓囊囊的挂包吃力地步行，便将一匹小马给了他。这样，他骑着马，把装有马列经典书籍的挂包放在马背上，行军就轻松多了。但在艰苦的万里征途中，书籍边走边丢，最后带到延安的只剩下一本《资本论》，这也是当时革命圣地延安唯一一本《资本

论》。毛泽东为撰写《矛盾论》《实践论》，专门向成仿吾借读了此书。如今，这本历经万里长征、写满毛泽东批注的《资本论》珍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长征胜利到陕北后，成仿吾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

后来，成仿吾曾多次为大学生、军人、机关干部作回忆长征的报告，也写过关于长征的文章。晚年，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回忆录，来记述长征的真实故事。1972年，成仿吾到南昌、瑞金、赣州、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参观访问，为撰写《长征回忆录》作准备工作。1973年春夏之交，成仿吾开始动笔撰写，他写一页，他的夫人抄一页，1976年完成初稿。1977年3月，人民出版社印出多本清样，送给参加过长征的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何长工、萧华、宋时轮、郭化若和宋任穷等，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同志们很认真地看了书稿，并很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之后，成仿吾亲自携带书稿到医院，请正在住院的郭沫若题写了书名。不仅如此，他还请著名的革命美术家古元设计了封面。

1977年10月，成仿吾80岁生日之际，《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日文、英文版。《长征回忆录》再现了长征全过程和所有重大事件，文字悲中寓壮，苦中有乐，生动地体现了红军藐视困难的气概，成为党史界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经典书目。萧华阅读后曾说：“只有读完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才能真正体会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所描述的那些崇高壮烈、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和情景。”

左权：万里长征里程的统计者

1905年3月，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1月转入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6队。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任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排、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战役、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左权在长征路上屡建奇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战将。长征时期，毛泽东称赞左权是“神枪手”，朱德赞扬左权是“模范军人”，是“钢铁般坚强、狮虎

般勇猛的优秀将领”。总参谋长刘伯承感慨地说：“他布置的作战计划简直天衣无缝！”

长征开始后，左权一直在红1军团任参谋长。红1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与敌战斗，作为军团参谋长的他，工作甚是繁忙。即使到了宿营地，别人可以休息了，他还要布置警戒，了解各部队的情况，然后加以汇总，向军委发电汇报，再安排制订第二天的行军、作战计划。

作为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要求红1军团把所有打的仗都记录下来。包括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和谁打的，打的结果是什么；红军每天从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中间多少距离。从江西到陕北，红1军团特别是军团部每天走过的路线和公里数，全部都有记录。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里程数，即是根据左权所带领的红1军团司令部所记录的里程数得来的。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访问后，把这个长征里程记录表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公开出版发表。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后遭遇的最为惨烈的一仗。之前，左权参与指挥红1军团担任前卫，连续突破了国

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红1军团在脚山铺附近的米花山、美女梳头岭、黄帝岭一带和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国民党军在强大炮火和1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发动猛烈进攻。红军则凭借高地临时修筑的工事，一次次打退他们。国民党军见从正面难以突破，便迂回到红军后侧，从红1师、红2师结合部的浓密树林间突破防线。有一股国军迂回到了红1军团指挥部，左权临危不乱，组织指挥警卫部队且战且退，巧妙周旋，终于使军团指挥部脱险。经过连续4昼夜的激战，红1军团胜利完成了掩护领导机关安全渡江的任务。

12月25日，中革军委指示在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达之前，攻占贵州施秉城的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左权运用奇袭取胜的战术，果断命令侦察科长带领侦察排和便衣班，先机占领施秉城，保证了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接着，左权又协助指挥了红1军团强渡乌江、进占遵义。左权听了遵义会议情况的传达后，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眠，他含着热泪对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1935年5月，红军到达川南冕宁县泸沽镇，开始抢渡大渡河的战斗准备。中革军委决定左权率红2师第5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之国民党军，以保证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左权率部从泸沽赶到小相岭，消灭了扼守隘口的全部守军，攻取了越西城，打开监狱，放出几百彝民。接着他又率部急行军70公里，到达海棠，消灭了从越西逃跑的国民党军2个连，活捉伪县长，而后翻过晒经关，袭击并占领了大树堡渡口，组织部队修筑工事，筹备粮草，扎筏造船，大有红军要从大树堡北渡大渡河、进攻富林、攻打雅安、直取成都之势。富林、成都守军惊恐万状，蒋介石速调两万军队增防雅安、富林等地，急电刘文辉24军严防泸定、天全、宝兴各县，确保成都安全。这时，安顺场渡口兵力相对薄弱，为红军主力抢渡大渡河减轻了压力。

过夹金山时，左权病了，聂荣臻也病了，当时部队只弄来一副担架，行军时，他们俩人总是互相推让。山上白雪纷飞，上山的人都成了雪人，到

傍晚，天气奇冷，左权拄着拐棍，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当翻过夹金山，与聂荣臻相遇时，两人紧紧地握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部队在懋功（今小金县）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决定将红1军团改编番号为第1军，左权任军参谋长。不久，红1军被编入右路军，担任前卫奉命最先过草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权一再向部队强调，要坚决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安全渡过草地。左权与指战员们一起亲尝百草，找出30余种可食的野草野蘑菇以作大部队充饥之用。经过6个艰难的日日夜夜，顶风雨，战严寒，忍饥受冻，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

过草地后，党中央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1军即为第1纵队，左权任纵队参谋长。第1纵队先到达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左权亲临腊子口前沿阵地视察，与红2师师长陈光、政委萧华一起制定了突破腊子口的作战方案。

左权参与指挥部队在六盘山青石嘴消灭国民党骑兵2个连、在吴起镇打垮国民党骑兵3个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

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左权命令纵队直属队总支书记肖忠渭带领警卫连、工兵连拔掉吉驼山的土围子，保证党中央在吴起镇的绝对安全。直罗镇一仗歼国民党1个师另1个团，左权参加了战斗指挥，并在总结直罗镇战斗的经验会上发言，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为了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左权和聂荣臻指挥红1师于1936年9月中旬占领将台堡，抵达界石铺，控制了静宁到会宁这段公路线，打开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大门，开辟了会师通道。10月9日，红1军团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1军团部队在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会师。

陈赓：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御林军”总指挥

1903年，陈赓出生于湖南湘乡。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学校编成干部团，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共1000余人。陈赓和宋任穷分别任干部团团长、政委。干部团的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战斗经验丰富

的军政干部。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主要任务是担当军委纵队的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干部团人数虽然不多，但兵精、将猛、装备好，不仅拥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而且每名指战员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再戴上缴获国民党军的钢盔，在长征行军队列中十分显眼。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经常走在这支队伍中。

1935年1月24日，红1军团进占土城。27日，当红军主力全部抵达土城一带时，川军4个团尾追而来。中革军委遂决定发起土城战斗，消灭追来的川军。但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川军依托有利地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发起反扑，步步进逼土城，甚至一度突破了红军防线，攻到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前沿。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为扭转不利局面，毛泽东急令干部团投入战斗，实施反击。

陈赓临危受命，亲作动员，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1营担任

主攻。这场恶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1营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接近山头时，与川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干部团当时装备了冲锋枪和钢盔，川军从没见过戴钢盔的红军。更令他们胆怯的是，干部团前仆后继的精神和一刻不停的反冲锋。毛泽东在看到川军凶猛的进攻被干部团压下去后，高兴地称赞道：“这个陈赓行，可以当个军长！”

土城之战，干部团伤亡近百人。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也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于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土城之战，干部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真正让干部团一举成名的，是在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激战狮子山一战。

干部团分成先遣营和后梯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宋任穷率3营先行，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直奔皎平渡。为了争取时间，出其不意，先遣营一律摘掉帽徽等红军标志，伪装成国民党军，顶着火辣辣



/ 金沙江皎平渡口。

的太阳，在野草丛生、乱石嶙峋的山间走了 60 多公里。晚上就在一片小树林里露营，睡到半夜爬起来，又以急行军的速度接着前进。

当时，干部团各营营长、政委以上干部都配有马匹。然而，马都用来驮伤伤病员了，连刘伯承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进。每个人都在和闷热、饥渴、疲惫搏斗。最终，先遣营克服重重困难，一昼夜强行军 80 公里消灭了皎平渡两岸的守军，控制了两岸渡口。事后，刘伯承感叹道：“干部团的同志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呢？他们走到了，还打了胜仗，靠的是什么呢？靠觉悟，靠党。”

干部团后梯队过江后，陈

赓亲率两个营急行军，去夺取位于金沙江西岸 20 多公里处的通安州。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段路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国民党守军据险以密集火力射击，使得干部团前进受阻，形势严峻。陈赓沉着镇定，命令部队分路迂回，终于打垮了凭险据守的国民党军，直插通安州。

接着，干部团鏖战狮子山，大破国民党军的“滚石阵”，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夺，终于占领了山顶隘口和临近高地。干部团第 2 营第 5 连连长郑士志等 10 多人牺牲，第 3 营第 8 连指导员孔开先和 2 排长等近百

人负伤。狮子山战斗是一场险战，干部团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伤亡 100 余人。因不明敌情和地形，在进占通安镇后又主动退出，回防狮子山隘口，主力退到江边大沙坝露营一夜，次日再进占通安镇。

在通安镇，干部团又与从会理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遭遇。为了给身后数万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干部团指战员，在陈赓的指挥下，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敌三，冲上国民党军已经占领的一把伞梁子和寒扑岭梁子。经过艰苦激战，陈赓指挥干部团以少胜多，攻克寒扑岭、一把伞梁子，相继占领通安州，俘获国民党军 600 余人。

干部团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被人们称为“铁帽子部队”，红军“御林军”的声威大震。自此，川滇边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铁帽子”红军的厉害，说子弹像蝗虫一样飞也打不倒他们，刀枪不入。而川军一听到头戴钢盔的红军和那个戴眼镜的“陈司令”，更是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会理县党史与地方志办公室撰著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会理历史》写道：“狮子山、阴

架河、一把伞——寒扑岭攻击战是关系红军渡江后北上生死存亡的关键战斗。如果失败则会被敌人压回大沙坝—中武山，红军1、3军团和中央纵队等部队则有全军覆灭的可能。”红军如果不迅速占领狮子山隘口，就会有被赶下金沙江背水一战的危险。所以说，狮子山战斗堪比激战娄山关、腊子口，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然而，在以往的长征史书中，却忽略了这场战斗，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或许是因为巧渡金沙江的重大行动遮掩了狮子山战斗的重要性。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撑不住，连日高烧昏迷不醒，不能进食，肝部肿大。医生诊断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需要立即排脓。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无法消毒，更不能开刀或穿刺。陈赓在危急关头自告奋勇：“我当过医生，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上海开过医院，除了拔牙和接生，我都干过。”“首先要降温，这样高烧下去可不行。赶快弄些雪来，给他肝区和额头实行冷敷，兴许有救。”他带人到山背阴处找

来雪，装入几个油布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额头及肝部等处。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苏醒，呻吟肚痛，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高烧渐渐退了。

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已经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军。毛泽东非常着急，再三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彭德怀命陈赓从迫击炮连抽出1个排组成担架队，并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大炮，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去。”陈赓亲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坚持要参加担架队。陈赓的双腿都受过重伤，尽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仍坚持一步也不离开担架。

周恩来不忍心让战士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几次硬要挣扎着下担架改骑马，但都被陈赓按住：“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是病号，上边交代了，你得服从我的指挥。”就这样，陈赓、杨立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7昼夜，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这深厚的战友情谊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1954年，杨立三病故，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

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给陈赓夫人傅涯送去，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

何涤宙：万里征途上逢水架桥的功臣

何涤宙1908年出生于浙江临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原名何兆昌，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24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工兵科，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任见习军官。1933年，任国民党军第52师工兵营营长，所在部队受命“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他在战斗中成为红军的俘虏。

红9军团地方工作组负责人冯雪峰，本着教育、改造、团结俘虏的原则，得知何涤宙有工兵技术专长，为人也老实、勤奋，便很重视做他的思想工作，经多次交谈和教育，将何涤宙调入瑞金红军大学担任高级班军事教员。在红军中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载，在红军大学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教官，这位少校后来参加了长征，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而且还入了党。此人就是何涤宙。红军大学首任校长兼政委、长征时

任红 9 军团政委的何长工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中，也记载何涤宙等转变过来的国民党军人，在红军大学中担任教学工作。在中央苏区时，何涤宙还“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许多桥。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前夕，红军大学改编入干部团，何涤宙在干部团上干队仍任工兵技术教员，随队参加长征。长征出发时，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担负在于都河上架设浮桥的任务。他们提前在于都、白鹅两处渡河点架起桥梁。当红军大部队并排四列稳步从桥上走过的时候，都由衷地竖起拇指夸赞几句。后来，大家把干部团架设的这两座木桥称作是“长征第一桥”。

何涤宙在长征中的最大贡献还要属他在乌江上成功架桥，保证了红军顺利渡过乌江。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江界渡口江面宽约 200 米，最深处达 20 多米，水流湍急，流速接近每秒 2 米。1935 年元旦，红 1 军团强渡乌江，陈赓、宋任穷亲率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 30 公里，赶到江界河渡口，冒着对岸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砍竹、扎竹排，执行搭建浮桥



/ 红军过乌江使用的竹笼子。

任务。

陈赓在江边指挥工兵连把用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但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瞬间就被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有人提议：用大石头做锚把门桥拖住。陈赓立即在现场进行试验，但还是不行。半天时间过去了，渡口边架桥工作仍无大的进展。赶到江边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大呼：“快把何教员叫来！”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宋时轮回忆：“陈赓跑上跑下急死了。当时有个俘虏叫何涤宙，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赓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

功。”

架桥经验丰富的何涤宙及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黄埔 4 期）奉命进行架桥技术指导。何涤宙不愧是科班出身，果然身手不凡。他和谭希林针对多次架桥失败的难题，设计了一种土制石锚固定竹排扎成的门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砍岸边竹子编篓，用竹篓装上石头，两个竹篓上下紧紧扣住，中间使用削尖的硬木桩交叉成十字连接，插入捆绑结实的竹篓，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住浮桥。”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工兵连很快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1 月 3 日下午，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直下遵义。《刘伯承传》《宋任穷回忆录》《萧劲

光回忆录》《耿飏回忆录》及多篇回忆文章中都记载有何涤宙参加搭建乌江浮桥的故事。

后来在渡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把何涤宙请去担任架桥的具体指导。干部团教员李一氓的回忆文章《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中写到，在金沙江边，何涤宙随刘伯承一起指挥架桥。李一氓渡江到北岸，他们坐在江边吃何涤宙为大家留下来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他们同住在北岸的岩洞里。因天气太热，无法入睡，俩人聊天，何涤宙讲述了刘伯承带领干部团占领皎平渡渡口的故事。《红军长征亲历记》一书中周士第（黄埔1期）写的《吃冰激凌》一文中，讲述了他与何涤宙、陈赓、宋任穷等一起过雪山，在雪山顶上吃冰雪的情节。

洪超：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曾任儿童团团团长。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5期学习。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彭德怀命令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担任开路先锋，他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当时虽然还没有“长征”一词，红4师则是

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锋。

1934年10月2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示，红军第4师师长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10月21日，洪超率部由赣县潭坑口向信丰县新田乡百石村前进。上午10时，与国民党军交火，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仗。

防守百石村一带防线的是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广东军，沿线修筑了数量众多的碉堡，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陈济棠虽然同红军达成秘密“借道”协议，但需要瞒着蒋介石。他害怕手下泄露此事，允许借道一事并未向下明确传达，只是向少将以上的军官含糊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为严格保守突围秘密，既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内容，也没有将准备通过的道路通知粤军（担心粤军有变，途中埋伏），便采取了强行通过的方式。于是在10月21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百石的时候，粤军依然没有撤退，红军只有以武力通过。

与粤军数度交手的红军，

对战胜眼前的守军充满信心。按照部署，洪超亲自率红10团进军百石村，师政委黄克诚率红11团、红12团等在侧翼打掩护，阻止粤军可能的增援。

10月21日上午10时，红10团在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军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此时，驻扎在金鸡圩的粤军一个营企图增援百石，邓国清团长、张爱萍政委指挥的红11团，谢嵩团长、苏振华政委指挥的红12团一同出击，将他们击溃。

碉堡里的守军200多人挤作一团，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到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围屋里。红军很快将“万人祠”围屋包围起来，随即高喊“缴枪不杀”，劝他们投降。然而，躲在围屋里的粤军却负隅顽抗，一会儿向外打几枪，一会儿又扔出几颗手榴弹，多名喊话的红军战士牺牲。

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11团与黄克诚政委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得



/ 洪超烈士纪念园浮雕。

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恼火，马上到前沿观察，亲自指挥战斗，果断命令：“用迫击炮坚决消灭敌人！”话音刚落，不幸被围墙内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血流不止。当师政委黄克诚赶来时，洪超艰难地睁开眼说道：“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随后牺牲，年仅 25 岁。黄克诚调来迫击炮，将一米多厚的麻石围墙炸开了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了进去，全歼顽固的粤军，取得了百石战斗的

胜利。

洪超为红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立下了首功。他是红 3 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老部下。彭德怀得知洪超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含泪和百石村群众掩埋了洪超烈士的遗体。彭德怀临终前还记得这位老部下，嘱咐说：“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

长。”

红 3 军团政委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洪超同志 18 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2005 年 5 月，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为洪超烈士墓题写“洪超烈士之墓”，表达了对洪超烈士的深切怀念。长征期间牺牲的红军官兵中，有记载的营以上干部约 430 余人，其中师职干部约有 80 多人。许多高级将领都没有留下翔实资料，洪超也如此，没有留下



/ 百石战斗遗址标志碑。

一幅照片。

长征路上唯一的黄埔红色文艺女兵

危拱之（1905—1973），河南信阳人。1922年考入汝阳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夏考入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

危拱之从小被家长裹了足，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下主动放开的。她的一双“解放足”给她的军事训练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她性格刚毅，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严格地按步兵操典的要求做动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危拱之嗓音

很好，有文艺特长，她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常给军校校刊《革命生活》投稿，经常参加活报剧的演出。1927年7月，从军校毕业的危拱之被派到张发奎部队医院，后参加广州起义。

危拱之随起义军到达海陆丰地区，在军队党代表办公室从事《红军生活》报的编辑工作。后返回河南，任河南省委委员、妇女科科长。1929年6月赴苏联，在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学院学习，1931年1月回国到上海。1932年春秘密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彭（湃）杨（殷）红军学校教员，兼做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的工作。后到

瑞金，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兼任工农剧社副社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4、第5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央苏区，她和伍修权、李伯钊等一起编写、创作、排演大批红色戏剧、歌舞，并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大批红色文艺战士，是中央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红色文艺的开拓者之一。她和李伯钊、石联星、刘月华等成为深受中央苏区军民欢迎、风靡一时的文艺明星。

长征出发前夕，中央指示妇女部部长李坚：草拟一份随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人数不超过30人。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其中有两人因故留在苏区，实际人数为30人），危拱之是其中之一。由此，危拱之成为跟随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为数不多的女红军战士。

高强度的长途行军不分男女，裹过小脚的危拱之靠着这双畸形小脚紧跟大部队。危拱之和其他女同志都相当出色，她们对自己提出要求，互相勉励：“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不得8块钱”指的是如果实在跟不上队伍，那么组织就会给8块钱生



邓颖超



蔡畅



康克清



刘英



李坚真



贺子珍



刘群先



李伯钊



钱希均



邓六金



李桂英



危秀英



廖似光



刘彩香



邱一涵



吴仲廉



周越华



谢飞



王隽媛



阙士英



钟月林



杨厚珍



谢小桓



李建华



金维映



吴富蕴



陈慧清



曾玉



肖月华



危拱之

/ 中央红军长征中的 30 位女红军。

活费，留其在当地老乡家里。给8块钱在当时已算优待，按规定，留下一个受伤干部给5块，战士给3块。

长征期间，危拱之任干部团总务科科长、队列科科长，负责军需供给。她身背几十斤重的行李，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在战士行军打仗后的休息时刻，为战士唱歌，为队伍鼓劲打气。由于种种原因，危拱之在苏区期间被错误审查，开除党籍，但她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毫无怨言，埋头苦干。

1936年春，在原陕北红军“西北工农剧社”的基础上，成立中央“人民抗日剧社”，刚被平反的危拱之任社长兼导演，还应邀出任红1军团“战士剧社”教员，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导演。1936年6月，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下了大量通讯报道。在陕北期间，斯诺除了采访红军领导人，还深入到部队和普通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斯诺观看了红军剧社的一场演出，特别采访了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并拍照合影，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用较长篇幅介绍了危拱之。

王诤：红军长征中无线电通信工作总指挥

1909年5月，王诤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28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通信科（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9年春，分配到国民党军第9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调第18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12月龙岗战斗后参加红军。

王诤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任命的人民军队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先后出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三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等职。

长征开始时，在王诤的领导下，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三局进行了一系列无线电通信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为长征中的通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编组机动通信分队。将无线电总队在总部工作的5个无线电分队组成无线电营，罗若遐（岳夏）任营长并兼无线电第1分队长；电话队改为有线电大队；通信学校改编为通信教导大队，校长刘光甫兼任队长，政委曾三兼任大队政委。以上单位编入军委纵队长征。

二是调配无线电台。长征时军委第三局共辖14个无线电分队14部电台。其中5部电台

配备在总部，即第1、第5、第6、第29、第30分队，分别担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同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及两个军委野战纵队，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委之间的通信联络任务。第5分队配置100瓦电台，担负中共中央同上海中央临时执行局国际台的联络任务，并通过该台与共产国际收转电报。其余9部电台配属给5个军团，其中再给红1、红3、红5、红9军团各增配1部机动电台。长征出发时，王诤为14部无线电台及分队精心配备了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保障通信工作的开展。

三是代行拟定部队代号。为加强长征中的保密工作，王诤组织军委第三局代中革军委重新拟定军委与各军团代号。军委为“红星”，军委直属各部名称前加“红星”二字，如红军通校代号是红星三大队。

四是筹集通信器材。从8月开始，王诤组织人员购买或从中央贸易局、交通科、通信材料厂等处筹措，到长征出发前，共筹集汽油、充电机、干电池等各种通信器材100余担，组成运输队200多人，但到陕北时只剩下1担零件。

长征开始后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中，有的电台因部队连续行军、情况紧急等情况，一度出现拒收电报、积压电报、延误联络等现象。为此，王诤组织军委第三局研究，很快提出解决方案，由负责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各军团联络的无线电第1、第6两个分队，采取交替前进的办法，即第1分队工作时第6分队行军，第6分队工作时第1分队行军，保证每天24小时内，始终有一个分队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电台无论什么时候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叫随应，确保了行军中的无线电联络不间断。

长征途中，王诤任中革军委第三局局长，领导着红军的通信工作和红军通校的办学工作，实际上是红军长征中无线电通信工作的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红军长征中以无线电为主，综合运用多种通信手段和方法，保障了长征中的作战指挥与协同。

在两次攻占遵义的战斗中，王诤亲率机关人员随部队进城，收集无线电台的急需器材和汽油，从而保证了渡过金沙江以后电台的电源供应。

入川后，汽油得不到补充，影响了电台工作，朱德、周恩

来等中革军委首长也为此焦虑，指示王诤想方设法保证联络不得中断。王诤立即召集刘光甫等几位有经验的机务人员商讨办法，采取了两条应急措施：一是把15瓦电台改为人力发电，原来是用汽油发电机供电的，当时没有小型手摇马达，王诤集中大家的智慧，改用人的双手转动两根木摇杆带动发电机发电（类手摇纺线车），报务员按电键发电报时，机务员就摇动摇杆发电。这种土造手摇马达代替汽油发电是一个极大的创造。二是除同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使用50瓦电台外（这时与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的电台已失去联络），对所属各军团均用15瓦电台进行联络，使仅有的一点汽油用在50瓦电台上。这些措施克服了电台发电机缺少汽油的困难，从而保障了中革军委对各地红军的作战指挥。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掩护会议的召开，王诤组织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报请朱德签发命令，停止军团与各师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控制各军团同中革军委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避免电波密集而泄露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动向。二是会议前后加

强有线电和徒步通信联络。有力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遵义会议期间，王诤组织军委第三局对通信保障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整理工作。组织召开了10个无线电分队负责人参加的前方电台干部会议，总结交流长征以来无线电通信的经验教训，部署当前与今后的任务，制定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电台和器材安全、改进通信联络的具体措施。根据总司令部关于进行精简缩编、准备打灵活机动运动战的新部署，王诤展开机构调整工作：局机关撤销第4科（教育训练科）和无线电营，由军委第三局直接领导管理总部的无线电分队，罗若遐专任第1分队长，曾三任政委；张瑞任第23分队长；有线电大队精简为电话队，通信教导大队精简为通信教导队，通信队精简为通信连，均归军委第三局直接领导。

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在王诤的领导下，军委总部和各军团通信兵以无线电通信为主要手段，保障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作战指挥与协同通信顺畅，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其中由朱德亲自签发的电报多达280余份。军委第三局直属无线电分队还



/ 遵义会议旧址。

抄收了红四方面军电台大量情报电报，收发了大量佯动电报，在帮助军委第二局进行无线电侦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4—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带领总司令部随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而军委第三局则随党中央同右路军一道北上。于是需要对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人员和电台做统一调配，合理使用，以便密切

两路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联络。当时，两路红军均须经过没有人烟的草原沼泽地带，用无线电传递命令、指示等，成为唯一的通信手段。

两军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5部无线电台，其中一、三台随张国焘、徐向前行动，二台担负无线电侦察任务，四、五台机动，临时配属到执行紧急任务的部队。而红四方面军共有5个军，每个军还不能配备一部电台。红一方面军有11部电台，除红1、红3军团各有两部，红5、红9军团各有1部外，军委纵队尚有5部。为使两个方面军的技术力量大

体接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红一方面军抽调电台和人员支援红四方面军，使红四方面军每个军部有一部无线电台。

王净和伍云甫政委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主动提出调1部50瓦电台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调3部15瓦电台给3个军部。在人员上，调出的多是领导和技术骨干。伍云甫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行动。王净把一批报务、机务技术骨干调给前敌总指挥部与红四方面军，如刘光甫、岳夏、刘寅、朱虚之、汪铭震、王玉衡、贾善等，大大增强了红四方面军的通信力量，很快就建立了两个方面军总部以及所属各个军部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保证了中共中央北上之后，党中央与朱德、张国焘之间，朱德、张国焘与红2、红6军团任弼时、贺龙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当有人提出调这些好电台和技术骨干会影响自身工作时，王净解释说：“我们应从全局出发，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如果把次品送给人家，是会误事的，那就不符合中央的意图。我们有长途行军的经验，有困难总可以克服嘛！”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4年4—7月

□ 吴亚明

4月

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抵达广东交流参访，宋涛在深圳会见

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一行1日抵达广东交流参访，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深圳会见马英九一行。

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3日7时58分，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23.81度，东经121.74度）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

国台办：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注台湾地震灾情

4月3日，台湾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将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提供救灾协助。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在北京会见马英九一行。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

两岸关系大局。

甲辰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在台湾桃园举行

农历三月初三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诞辰。11日（农历三月初三），甲辰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在台湾桃园市黄帝雷藏寺举行，缅怀先祖，慎终追远，传递两岸“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精神。

两岸企业家峰会在江苏举行工作会晤

两岸企业家峰会祖国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与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21日在南京举行工作会晤。双方商定2024年峰会主题为“打造两岸新时代产业链，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并就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供应链合作，继续支持台企融入祖国大陆内需市场、参与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加强双方各层面、各领域交流合作等重点工作达成共识。

国台办：将进一步拓展台胞证应用领域和服务范围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拓展台胞证应用领域和服务范围，让台胞享受到更好服务和更多便利。

国台办：希望台湾同胞来大陆寻根，“补上在台湾没有上的课”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了解民族历史是台湾同胞身为中华儿女的权利，理应得到保障。

希望台湾同胞都能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也希望台湾同胞来大陆寻找自己文化和血缘的根，补上在台湾没有上的课。

王沪宁会见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7日在北京会见傅崐萁率领的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王沪宁表示，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同台湾同胞一道，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文化和旅游部：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28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权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傅崐萁一行。双方就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和旅游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饶权表示，文化和旅游部一贯支持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界各领域交流合作，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后，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

海关总署：将批准符合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柚等农渔产品输入祖国大陆

海关总署副署长赵增连28日在北京会见傅崐萁率领的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表示，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与中国国民党及台湾有关方面就恢复文旦柚等台湾农渔产品输入祖国大陆加强沟

通，推动台湾业者加强源头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海关总署将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依法依规批准符合祖国大陆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柚等农渔产品输入祖国大陆。

中国红十字会愿向台湾花莲地震灾区捐赠活动板房

为支持台湾花莲县开展救助工作，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向台湾红十字组织捐赠一批活动板房，用于花莲灾区民众的人道救助，首批将发送100套。

国台办：希望台湾方面尽快全面恢复两岸空中、海上直航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日应询表示，希望台湾方面充分考虑两岸民众及航运企业的诉求，尽快全面恢复包括平潭—台北、平潭—台中、厦门—台中、厦门—基隆、浙江大麦屿—基隆航线在内的两岸海上客运直航，恢复开通天津等30个大陆航点与台湾空中客运直航。

福建发布第二批政策措施深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福建省有关部门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第二批13条政策措施。

5月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声明答记者问

外交部发言人2日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声明答记者

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将美领导人作出的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承诺落实到行动上，停止借世界卫生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台湾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回应大陆善意、推动观光交流

进入“五一”假期，祖国大陆各地再次呈现人潮如织、游客盈门景象。台湾舆论在广泛关注的同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积极回应大陆方面宣布的推动两岸交流举措，抓住机会让两岸旅游交流尽速恢复常态。

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冲撞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红线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涉台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剑6日表示，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打“台湾牌”必然撞到南墙，支持“台独”必将引火上身。中方奉劝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冲撞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红线。

台湾社会各界联署呼吁“珍惜和平、两岸共赢”

台湾社会各界7日在台北发起“珍惜和平、两岸共赢”和平宣言联署，向即将上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出“两岸一中、重启协商”“废除‘反渗透法’”“导正文史课纲”等六项诉求。

第十一届“大江论坛”呼吁推动两岸交流、共图民族复兴

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大江论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10日在辽宁沈阳开幕。两岸各界约150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推动两岸交流，共图民族复兴”主题交流分享。

外交部：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日表示，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鉴此，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这一决定有充分理由和坚实法理依据。

甲辰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系列活动举行

15日，“问祖炎帝 寻根高平”甲辰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系列活动在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举行。来自全球多地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共拜华夏始祖，共融血脉亲情。

第二十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

第二十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16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届海交会以“深化两岸融合、建设第一家园”为主题，聚焦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旨在为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推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开幕式上，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首批政策正式发布。

台湾统派团体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废除“反渗透法”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岛内统派团体 19 日在台北举行集会抗议，要求民进党当局废除“反渗透法”，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王毅：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部长会议期间，就台湾地区“5·20 就职仪式”阐明了中方严正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

国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表态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20 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罔顾民意、逆流而动，释放了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

台湾各界批评赖清德“5·20”讲话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前景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的“5·20”讲话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普遍失望且忧虑，认为其言论以“抗中保台”为主轴，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前景，恐将台海局势拖入前所未有的严峻境地。

国台办：“联合利剑—2024A”演习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

23 日 7 时 45 分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

战区在台湾海峡，台湾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屿、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23 日答记者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是对外部势力纵容支持“台独”、干涉中国内政的严厉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

联合国发言人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 23 日在例行发布会回答有关问题时说，联合国遵循 197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联合国的立场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两岸 42 支队伍聚首厦门赛龙舟

2024 年第十七届“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暨第九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25 日在厦门市集美龙舟池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 42 支龙舟队伍，在厦门龙舟竞渡。

世界卫生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

第 77 届世界卫生大会 27 日做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 77 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

外交部发言人 27 日就第 77 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我们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台独”与台湾同胞利益背道而驰，“倚外

谋独”绝无出路。中方也敦促个别国家，停止歪曲挑战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

第四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广州开幕

以“守护共同家园，共创民族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29日在广州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 200 余人出席。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第二批）关税减让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进一步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自 2024 年 6 月 15 日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润滑油基础油等 134 个税目进口产品，中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东湖论坛在武汉举行

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东湖论坛 31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拉开帷幕。400 多位两岸青年代表相聚，围绕“科技强国”“健康中国”“文化兴国”等议题深入交流研讨，促进互学互鉴。

6月

台湾各界：谋“独”挑衅破坏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实施基础，终究“祸台”“害台”

祖国大陆发布关于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部分产品（第二批）关税减让的公告。台湾舆论和业界多数认为，这是大陆对赖清德就职讲话谋“独”挑衅的进一步回应。事实已反复证明，“台独”分裂行径只会“祸台”“害台”，只会让台湾企业、民众利益受损。

国台办：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12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何来所谓“自卫权”？民进党当局妄想给我们维护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划线设禁”，完全是不自量力。我们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胆敢轻举妄动，只会自取灭亡。

台湾三三会组团赴祖国大陆参访，期冀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丰率团到北京、天津、雄安新区参访。林伯丰表示，三三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立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都是中国人。“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两岸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经贸、文化及人员交流。台湾工商界对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有着普遍期待，我们将继续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多作贡献。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4 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从战略和全局上谋划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引领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大会 15 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习近平致信祝贺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

在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向黄埔军校同学会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黄埔军校同学会要牢记建会宗旨和政治使命，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和组织建设，发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统，为同心共圆中国梦广泛凝心聚力。希望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不忘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

学会成立 40 周年座谈会 17 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外交部：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美国再次对台售武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20 日表示，美国罔顾中方一贯反对和严正交涉，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台办举行专题发布会解读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司法文件

国台办 21 日举行专题发布会，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马岩，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庆彬，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孙萍，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局长田昕，解读《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条文。

2024 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举行

2024（甲辰）年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 21 日在台湾新北市举行，数百位台湾民众在现场共襄盛举。当日，祖国大陆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

11 年异地同时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致敬。

赖清德上台满月，岛内舆论批其把台湾推向危境

赖清德上台一个月，在内部改革和两岸关系议题上不断激化分裂和对抗，把台湾推向混乱和危险境地。岛内舆论纷纷用“好斗”“傲慢”“偏执”评价其作为，认为其首月成绩单“显然不及格”。

外交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就外交部公布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体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

岛内舆论：大陆依法严惩“台独”，能防止台海形势进一步恶化

祖国大陆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持续引发台湾各界高度关注。岛内舆论认为，这份惩治“台独”的司法文件具备执行力，对“台独”顽固分子具有极高震慑力，能防止台海形势进一步恶化，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推动和平统一的保障。

国台办：国家依法惩治“台独”分裂犯罪具备坚实法理基础和充分法律依据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可辩驳

的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国家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充分的法律依据，是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应有之义，也是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义之举。凡是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不管其身在哪里，国家执法司法机关都将一追到底，依法严惩。

国台办：强烈反对民进党当局借提升所谓旅游警示进行政治操弄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8 日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恶意抹黑大陆有关司法文件，借提升所谓旅游警示进行政治操弄，是对广大台湾同胞赤裸裸的威胁恐吓，严重侵害台湾民众正当权益，破坏两岸关系发展。

两岸文学论坛暨青年文学交流活动在厦门启幕

以“诗书作伴·同心同行”为主题的 2024 两岸文学论坛暨青年文学交流活动 29 日在厦门翔安启幕。舒婷、陈若曦、张晓风等来自海峡两岸的 140 多位知名作家及高校青年聚首厦门，共话两岸文学的交流与发展。

7 月

2024 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

由国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4 两岸青年峰会 3 日在北京开幕，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 600 人出席开幕式。

全国台联第二十一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福

州开营

全国台联第二十一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开营式暨两岸青年联欢晚会 3 日在福州举行。本届千人夏令营营员主要来自岛内高校及海外台胞青年，总人数约 1500 人。

上半年 42 万人次台胞自福建口岸入境

国家移民管理局 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 1 月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台胞申办出入境证件和赴闽人数大幅上升，上半年自福建口岸入境的台胞达 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倍。

“我家的两岸故事”在南京巡展

5 日，“我家的两岸故事”南京巡展在南京大报恩寺开幕，本次展览是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曾在高雄、上海、台北、福州等地展出。此次展览分为离乡、思乡、新故乡、返乡四个主题展区，将持续至 8 月 15 日。

台湾统派团体举办演讲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7 周年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7 周年，统一联盟党、劳动党等统派团体 6 日在台北举办演讲会，多位发言者从不同视角回顾台湾同胞的抗战历史，呼吁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正确认知民族历史。

第十届两岸学子论坛聚焦磨砺与笃行

第十届两岸学子论坛暨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8 日在厦门大学启幕。论坛吸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约 400 位专家

学者及青年学子与会。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举办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8 日在杭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 1000 余位嘉宾和青年代表相聚一堂，共叙血脉亲情，共促融合发展。

2024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登场，台湾民众赴陆旅行热情高涨

2024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 12 日在台北世贸一馆开幕。祖国大陆 12 个省份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及企业共 155 人参展，为疫后祖国大陆赴台最大规模的交流团组，向台湾民众展现祖国大陆文旅优势叠加、深度融合的丰富样貌。祖国大陆各省份的展位前，索取旅游宣介手册、询问景点信息的民众络绎不绝。

外交部：日本没有资格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老调重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渲染地区局势紧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林剑表示，日本曾对台湾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没有资格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

第 12 届云台会启动

以“共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新局面”为主题的第 12 届云台会主题活动 16 日在云南昆明启动，两岸 350 余名嘉宾齐聚昆明，共叙亲情、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外交部：坚决反对日方同台湾地区实施联合海上训练

针对日本近日同台湾地区实施联合海上训练，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1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令港澳台同胞倍感振奋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港澳社会各界和在祖国大陆台商台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表示将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新的重大机遇，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

国台办：赖清德再次暴露实施“台独”分裂活动本来面目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22 日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公然鼓噪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再次暴露了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本来面目。

两岸青年企业家菁英峰会暨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研讨会在江苏举行

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主办的 2024 两岸青年企业家菁英峰会暨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研讨会，21 日在江苏省昆山市开幕。此次活动为期 5 天，旨在搭建连接两岸青年情感与事业的桥梁，为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

国台办：阻挠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制造两岸对立对抗的图谋都必落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4 日应询指出，岛内民调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乐见两岸恢复交流、降低紧张。这再次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主流民意。奉劝赖清德当局顺应民意，认清形势，放弃“抗中拒统”“倚外谋独”的幻想。任何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分裂国家的行径，都必将失败。任何阻挠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制造两岸对立对抗的图谋，都必将落空。

福建通过新规保护利用闽台关系档案

《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已经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自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将有力促进闽台关系档案的保护利用。

复旦大学夺得第二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冠军

经过 22 场比赛的激烈角逐，第二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27 日在福州落幕。复旦大学夺冠，台湾世新大学、台湾大学分获亚、季军，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勤思和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郑国廷荣获“最佳辩手”称号。

“核三厂”1号机停机，缺电忧虑笼罩台湾

位于屏东恒春的台湾第三核能发电厂（简称核三厂）1号机历经 40 年运转后于 27 日停机，退出供电行列，正式进入除役阶段。岛内各界普遍担忧，少了核电这个基载电力后，台湾将陷入供电不稳、电价更贵、减碳更难的困境。

军工解码：欧洲“台风”战斗机透视

□ 石稼

欧洲“台风”战斗机是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同设计研发的一款全天候双发多用途战斗机，分单座和双座两种型号，主要用于执行国土防空和空中优势作战任务，兼具对地对海攻击能力，是一款典型的超音速巡航、短距起降、超视距攻击和良好低空机动性能的三代半战斗机。“台风”战斗机和法国达索“阵风”战斗机以及瑞典萨博 JAS-39“鹰狮”战斗机因其优异的性能表现，并称为欧洲“三雄”。目前，除了参与研发的欧洲四国外，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奥地利等国也相继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今年以来，美英两国连续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的一些目标发动空袭，所使用战机中就有“台风”战斗机。

机体设计

气动外形设计。“台风”战斗机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前置鸭翼、三角翼、单垂尾的气动布局，与并称“欧洲三雄”的法



/ “台风”战斗机（EF-2000）。

国“阵风”战斗机和瑞典“鹰狮”战斗机具有基本类似的气动设计理念，与上述两款战斗机最显著区别：一是前置鸭翼的位置更加靠近机头方向，位于驾驶座舱前侧，属于“远距耦合”设计。二是进气口位于机身正下方，为两个并列的矩形。“阵风”和“鹰狮”战斗机的“近距耦合”主要优点是利用鸭翼和三角翼产生的涡流干扰获得大迎角升力，增强过失速状态下的飞行稳定性，缺点是超音速飞行

时阻力较大，横向操控性能不稳定。“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主要优点是有益于控制机身配平，提高机动性能和敏捷性能，增强超音速飞行时的盘旋能力，缺点是增加了机身长度和尺寸，对飞控系统要求较高。为克服“远距耦合”的不利因素，该机在两侧鸭翼和机翼之间的座舱正下方，设有一块凸起的涡流发生器。“台风”战斗机的气动外形配合大推力发动机和先进的全权限四余度数



/ 不同涂装的各国空军“台风”战斗机。



/ “台风”战斗机座舱盖。

字飞控系统，使其具备优秀的低空高速机动能力和大过载机动能力，能在空中格斗中快速改变机头指向获取优势，且具备短距起降能力。

机体结构设计。“台风”战斗机机身、机翼、垂尾、座舱、蒙皮等部位大量采用碳纤维、玻璃纤维、铝锂合金、钛合金等材料，在降低机身重量的同时，尽可能提升机身强度，机体寿命达到6000小时。全机复合材料重量占比约为40%左右，其中碳纤维复合材料占70%左右，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占12%。“台风”战斗机采用机腹进气方式，在进气道侧面设有高温出口，在机翼前端翼身融合处设有用于冷却机内航电设备的辅助进气道。该机总共设有13

个外挂架，具备空中加油能力。

航电架构设计。“台风”战斗机拥有先进的航电设备，各类航电系统均基于北约组织标准数据链，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进行安装和部署，整个机载系统采用STANG3838北约标准数据总线，由光纤保障各电子系统间的主干信道连接。后期的“台风”战斗机装备了CAESAR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使得整机对隐身飞机的探测能力和对地攻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机内航电系统主要包括自动化座舱显示系统、4余度全权限飞控系统、无源红外搜索跟踪系统(PIRATE)、武器控制系统(ACS)、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MIDS)、集成化电子战辅助系统(DASS)、自检

测系统(HUMS)、自动着陆系统(ILS)、地形跟踪告警系统、导航系统以及各类辅助系统等。其中，集成化电子战辅助系统拥有自动监测各种空中和地面威胁的能力，整个系统由来袭导弹告警器、雷达告警器、激光告警器、红外干扰弹/箔条弹/拖曳诱饵弹、集成化电子战辅助系统计算机，以及遍布机身的13处传感器和电子战吊舱等部件组成。

机载系统设计。整机机载系统以雷达火控系统和高度集成化的电子战辅助系统为核心，采取“资源整合、融合处理、互为备份”的设计风格，在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支持下，逐步改进升级。目前，“台风”战斗机主要包括Block2、Block2B、

Block5、Block5A 等多个版本，主要区别在于替换了更先进的模块化航电设备、更新了航电系统各软件版本，提升了对地/对海目标探测能力和多样化武器挂载能力。另外，由于各国机载武器装备的区别和使用侧重点的不同，“台风”战斗机的机载武器系统、语音识别系统、座舱显示系统等软件版本和功能也存在一定差异。

驾驶座舱设计。“台风”战斗机采用了镀膜处理的传统气泡式座舱盖，飞行员具有良好的操控视野，并且有利于降低座舱的雷达散射截面积。在驾驶座舱内部，由3个彩色多功能显示器和1个平视显示器组成座舱显示系统，各多功能显示器可以随意切换显示飞行参数、作战任务、战场态势、目标情报、地形数据、武器状态等信息。平视显示器主要显示飞行控制参数、作战任务信息和武器瞄准信息。“台风”战斗机为驾驶员配备了先进的“打击者II”头盔显示器和瞄准系统，能够显示参考字幕、动态图像和夜视图像等内容，实现“看见即锁定”功能，从而帮助飞行员快速指向打击目标，并支持大离轴角的导弹攻击行动。“台风”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款应用机

载语音输入系统的战斗机，该系统可以帮助飞行员实现24类原本需要用手操控的飞行指令。另外，该机还采用了世界著名的MK-16A弹射座椅。

性能特点

隐身性能。“台风”战斗机在设计时并未注重隐身性能，前置鸭翼、发动机进气口和驾驶座舱等部位均是较大的雷达散射源。“台风”战斗机主要的隐身措施采用无源传感设备，以最大限度减少电子辐射。“台风”战斗机在作战行动中，也注重超低空突防战术，在先进的机载雷达和地形匹配系统的帮助下，能够保证“台风”战斗机的超低空高速飞行能力，降低了被发现概率。在机体设计上，该机机腹设有半埋式武器挂架，相对于直接外挂在机翼下的武器装备有较好隐身效果。该机进气道为S型设计，向上并略向外偏转，使得发动机叶面不会暴露在外，避免了雷达波直接照射。另外，该机在机体复合材料和涂料方面，选用了具备一定雷达吸收能力的材料，覆盖机翼前沿、进气道和方向舵外缘及其他重点反射部位。总之，“台风”战斗机凭借较小的机身优势和部分雷达隐



/ “台风”战斗机驾驶座舱。



/ “台风”战斗机飞行员头盔。

身措施，正面雷达散射截面积(RCS)约为2平方米，红外隐身方面略优于法国“阵风”战斗机。

飞行性能。“台风”战斗机装备2台欧洲发动机公司生产的EJ200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为60千牛，加力推力可达90千牛。该型发动机是一款双轴再加热涡轮风扇发动机，采用的是3级轴流式风扇压缩机和5级轴流式高压压缩机，具



/ “台风”战斗机的S型进气道。



/ “台风”战斗机的EJ200发动机。

有结构简单、油耗低、推重比高等优点。“台风”战斗机虽未采用推力矢量技术，但鸭翼气动布局 and 数字飞控系统赋予了其优秀的机动能力，具备超音速巡航、高空小半径盘旋、瞬时大过载转向等优点，垂直机动性能和近距缠斗能力更是出类拔萃。全权限数字飞控系统还为飞行员提供了“无忧操作”辅助，避免了高速飞行下可能出现的误操作。“台风”战斗机作为一款突出空优任务的战斗机，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根据携带的武器载荷方案不同，作战半径可达600至1400公里，足以满足欧洲各国国土防空任务需要，在进行空中加油情况下，跨大洋飞行也没有丝毫压力，该机多次参加美国“红旗军演”就是最好的例证。

探测性能。“台风”战斗机早

期型号装备的是 Captor-M 机械扫描雷达，后期开始逐步换装 Captor-E 有源相控阵雷达，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参与三代半战斗机的销售竞争。Captor-E 有源相控阵雷达拥有约1500个T/R模块和超过30种工作频率的电子波束，具有对空探测、对地/对海探测、新型导弹制导和敌我模式识别等功能，能够快速准确搜索和跟踪多个目标，并增强了对空中低可探测性目标的探测能力和全寿命周期管理能力。该雷达可在50公里外发现F-35战斗机。该雷达前半圆探测范围 $\pm 100^\circ$ ，比原有雷达的探测扇面提升了40%。该雷达采用主动电子干扰工作模式，具备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成像能力、地形测绘能力和地面目标跟踪能力，具有超低空突防和对地机动目标实施

精确打击的优异性能。

“台风”战斗机的无源红外搜索跟踪系统(PIRATE)安装在座舱左前方，主要拥有3—5微米和8—12微米的双频段工作模式，能够同时对200个空中、地面和海上目标进行自动识别、持续跟踪和作战优先级判断。在一定条件下，该系统可探测到90—130公里外的第四代战斗机红外特征。美国“红旗军演”中，“台风”战斗机曾多次凭借该系统发现F-22战斗机并取得了模拟空战的胜利。此外，“台风”战斗机的集成化电子战辅助系统在不需外挂电子战吊舱的情况下，还装备有来袭导弹告警器、雷达告警器、激光告警器等传感器设备，使“台风”战斗机具有360°的防御性探测能力和威胁识别能力。

综合系统性能。“台风”战



/ “台风”战斗机的 Captor-E 雷达。

机以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为核心的综合系统具备较好的信息共享能力，核心计算机能够处理大批量海陆空目标信息，并逐一与机载数据库内容进行比对识别。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具备多模式通信与加密能力、Link-16 通用数据链互联能力、无线电静默和辐射控制能力等，能为飞行员提供综合战场态势和敌我识别能力。导航系统具备极高的 GPS 定位精度和惯导精度，能够支持地形自动匹配的超低空飞行需求，还具备防撞告警、低速低攻角自动恢复、自动改为水平飞行等能力。自动着陆系统可利用微波实现全天候昼夜着陆。集成化电子战辅助系统发现威胁后，可进行有源电子对抗，并利用一次性拖曳雷达诱饵或红外 /



/ “台风”战斗机的典型挂载方式。

箔条干扰弹进行被动防御，有源电子对抗设备还可以通过照射本机发射的箔条进一步增强雷达反射效果。“台风”战斗机还可以挂载最先进的“狙击手”光电瞄准吊舱（ATP），即美国 AN/AAQ-28 吊舱的欧洲改进版本，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对地红外 / 夜视 / 可见光侦察能力、高清图像处理能力和激光稳定跟踪能力，使“台风”战斗机能够隐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识别和打击。

性能参数

设计单位：欧洲战斗机公司

机长：15.96 米

机高：5.28 米

翼展：10.95 米

翼面积：51.2 平方米

最大起飞重量：23.5 吨

推重比：1.15

机内燃油量：4.5 吨

实用升限：16500 米

最大航程：2900 公里

最大航速：2.0 马赫

爬升率：315 米 / 秒

限制过载：9G/-3G
 外挂点数量：13 个
 最大战斗载荷：7.5 吨

武器装备

“台风”战斗机拥有优秀的武器挂载能力，在以对空作战任务为主的基础上，具备较好的对地对海攻击效能，可根据任务使用北约制式的各种机载武器，包括 AIM-120 系列中程空空导弹、“流星”中程空空导弹、AIM-9 系列近程格斗导弹、ALARM 反辐射导弹、AGM-84 “鱼叉”反舰导弹、Penguin AGM-119 “企鹅”反舰导弹、Brimstone “硫磺石”反坦克导弹、“风暴阴影”巡航导弹、“金牛座”巡航导弹、GBU-10/16 激光制导炸弹、“宝石路”（Paveway）激光制导炸弹、BL-755 集束炸弹、CRV-7 火箭吊舱等。另外，除英国版本的“台风”战斗机外，其余版本均装备 1 门 27mm 机炮，备弹 150 发。

综合评价

“台风”战斗机作为世界第一款多国研制的三代战斗机，虽然集欧洲四国先进技术成果于一体，且大幅节约了研发经费，但因各国作战需求有差异，在指标性能上的分歧和妥协使得该

型号	射程	制导方式	最大挂载量
AIM-9X	18 公里	红外	6
IRIS-T	25 公里	红外	6
AIM-120	120 公里	主动雷达 /GPS/ 数据链 / 伙伴引导模式	6
“流星”	150 公里	主动雷达	6
ALARM 反辐射导弹	20 公里	惯导 + 被动雷达	4
AGM-84 “鱼叉”	300 公里	主动雷达	4
Penguin AGM-119	55 公里	被动红外	4
“硫磺石”反坦克导弹	60 公里	激光 + 毫米波雷达	18
“风暴阴影”	250 公里	惯导 + GPS	2
“金牛座”巡航导弹	350 公里	惯导 + GPS	2
GBU-10/16 激光制导炸弹	/	激光	4
“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	/	激光	4
BL-755 集束炸弹	/	/	6
CRV-7 火箭吊舱	/	/	4

机过于追求平衡，综合性能并不十分出众，造价昂贵，性价比不高，与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与美俄等国的第四代战斗机相比更有一定差距。综合来看，“台风”战斗机是一款模块化、智能化、高效能的多用途战斗机，具备优秀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和耐用性，属于第三代半战斗机中的佼佼者。

为进一步提升作战性能，近年来“台风”战斗机的改进升级工作一直在进行。2017 年，英国和意大利相关方“组团”宣布，将投入大笔资金升级“台

风”战斗机的防御辅助子系统。2022 年，又宣布将斥巨资为“台风”战机换装新雷达。去年 9 月，英国相关方在 DESI 防务展期间先后签署两份合同，计划为该军“台风”战斗机配置“打击者”2 全数字头盔和柯林斯宇航公司研发的超高清大屏显示器。去年 11 月，BAE 系统公司宣布，“台风”战斗机正在集成其研制的 GPS 抗干扰接收机。“台风”战斗机的升级改造一方面标志着战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折射出一个事实：其发展面临着其他诸多先进战斗机的挑战。

和平将军张治中(中)

□ 张静生

主政新疆，释放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和平解决“伊宁事变”，释放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并护送到延安。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后，张治中护送毛泽东到延安，旋即被蒋介石调派到新疆处理“伊宁事变”，并于1946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管辖甘、宁、青、新四省，并兼任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启程前夕，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特意前往重庆上清寺桂园送行，周恩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送行，再就是拜托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提出，并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设法救出来。”张治中慨然答应。

原来，1934年盛世才发动政变，通过新疆边防督办的职位，肃清了其他对手，成为“土皇帝”。为维护自身统治，



/ 张治中。

他假意同苏联亲近，甚至不惜出卖新疆的利益。同时，他妄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实力，多次“恳请”中共派得力干部进新疆帮助工作，甚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民族大义，中共先后派陈云、邓发、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到新疆工作。据统计，当时中共先后派出200多名干部到新疆的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工作。然而，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和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化，惯于投机的盛世才认为再依靠苏联“油水”不

大，在蒋介石集团的拉拢下转而投向国民党，开始迫害共产党人。1942年8月，盛世才把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及其家属在内的150多位在新疆工作的中共人员集中到八户梁，先软禁，后秘密逮捕入狱。后来，毛泽民、陈潭秋等被杀。面对严峻形势，中共中央立即组织营救，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放人，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

1944年，新疆伊宁地区出现武装暴动。当地民族军先后攻占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等重镇，并向迪化（今乌鲁木齐

齐)挺进。此时,盛世才因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被调到重庆任农林部部长。1945年8月,国民党驻三区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新疆全省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主持西北军事大权的朱绍良和主政新疆的吴忠信已穷于应付,多次向重庆告急,要求速派大员赴疆。蒋介石本来已任命张治中主持东北军政,又要他参加国共和谈,但新疆问题出现后,他不得不改变主意。1945年9月,蒋介石急派张治中飞往迪化,调查这次事情的真实情况,谋求和平处理。

张治中9月13日到达新疆迪化,先后会晤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嶠、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耶夫,并会见了新疆各族领袖人物,广泛深入了解情况。10月14日,张治中及顾问班子在迪化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初次谈判。经过各方共同努力,1946年1月2日,国民政府与三区代表双方签订《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和附文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1946年3月初,张治中第

二次赴疆谈判,重点解决军事问题。为此,蒋介石正式任命张治中主政新疆,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经张治中和三区代表努力,在苏联方面居间调停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6月6日签订附文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6年6月18日公布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组织名单。7月1日,3万多人在迪化和平广场集会,庆祝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中央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迪化监誓,联合政府中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同时宣誓就职,表示在“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方针下为建设一个崭新的新疆共同努力。

张治中到新疆履职后,虽然十分繁忙,但没有忘记周恩来、邓颖超的嘱托,不久就派屈武到狱中调查了解情况,结果令人震惊。张治中了解到监狱的环境和被关押人员的情况后,内心十分焦灼,要求属下尽快为释放并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做准备。同时,张治中多方努力改善条件,还命人带去钱物慰问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转达了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和慰问。张治中多次让秘书余湛邦给蒋介石发电报,

指出毛泽东在重庆和谈时曾提出要求释放这批政治犯,蒋介石也同意了,而且写进《双十协定》和政治协议。如能主动宣布释放,对国共合作和当前形势都有利无害……他还特别强调:“如把中共政治犯继续拘留不放,那就首先很难取信于新疆三区民众,你给我到新疆的任务亦难以完成……”蒋介石只好复电勉强同意。

新疆距延安千里,沿途地形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事故或伤亡。当时新疆治安很差,土匪抢劫是常事,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同意释放这批共产党人,随时有可能对他们动手。特别是这批人在关押期间遭受迫害,大多体弱多病,难以经受长途颠簸。为此,张治中着人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护送方案。调动10辆大卡车,每车坐10人,每个人在车里可坐可躺。车队配备军医、军需、电讯人员,另调一个警卫排随队护卫。他指派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和卫士连连长唐建贵负责此次护送任务。出发前,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驻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去电,请他们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把这件事电告了周

恩来。

1946年6月10日凌晨，车队载着100多名中共人员从第二监狱启程去往延安。车队晓行夜宿，由于事先电告谷正伦，一路顺利，于6月19日抵达兰州，比原计划提前3天完成行程。

车队在兰州期间，张治中发来电报：继续护送，负责到底！当日，车队离开兰州向西安东进。6月30日，车队抵达西安市区。胡宗南召见刘亚哲，声称：“这批人必须就地扣留！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中原已挑起战端，全面内战已经开始。远在新疆的张治中为此焦急万分，他想到新疆文教界的张紫葛曾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身边任机要秘书，深得宋美龄信任。为了保险起见，他安排张紫葛乘飞机赶往南京，以这批中共人员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为由，说服了宋美龄出手相助。

7月4日，胡宗南放行。7月10日，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满载百余名中共人员的车队坎坷万里，终于到达富县城南的国共交界处——吉家村。

后来，朱德写了亲笔信，向张治中表示感谢。几个月后，张治中回到重庆，董必武又亲



/ 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自到张治中家中看望，以致谢意。

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拒绝签字，和谈破裂，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和其他团员一起留在了北平，但他的身份还是国民政府西北行政长官。

9月8日，毛泽东约张治中到菊香书屋，告诉他，中共中央已派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进军。三区民族军与解放军将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国民党10万人马已成瓮中之鳖。毛泽东说，我们寄希望于新疆方面

能够认清形势，宣布起义。我们从新疆得知的情况是，只要你张治中给陶峙岳、包尔汉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现在希望你给他们去电，促成此事。张治中知道自己的身份出面是合适的。他说，我早有此意，只是现在不知能否与陶峙岳、包尔汉取得联系。毛泽东随即笑笑说，我们帮你接上头，中共中央已派邓立群去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由他转送。张治中说：“那好，我马上准备电文去。”新疆和平起义，关键人物就是陶峙岳，他是张治中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在胡宗南手下工作多年。新疆的10万人马中，除了马步芳一个军的骑兵部队，以及盛世才属下的两

个旅外，其余都是陶峙岳的部队。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后，将陶峙岳调入新疆。陶峙岳为张治中稳定新疆局面立下了功劳，对张治中自然是心悦诚服。因此，张治中出面与他沟通，是再好不过的事。经过一天的准备，并报请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张治中给陶峙岳和包尔汉的电文于9月10日发出，电文要求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11日，张治中又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文，分析了新疆和平起义会出现的情况和处置办法，就九个方面的内政外联问题作出指示，尽量把和平起义的各种因素都考虑周全。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对和平起义之事正在审慎筹议，前提是保障国家领土的统一完整，维护新疆全省的安定，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在这些工作做充分后，将立即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并希望张治中能来新疆。陶峙岳还专门复电张治中，就张治中提出的九个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要求张治中随时给予指示。张治中于9月24日给陶峙岳、包

尔汉回电，对他们响应中共和平解放新疆号召宣布起义的积极态度表示充分肯定。并告诉他们，毛泽东读了他们的电文感到很高兴。

在张治中的积极沟通和促成下，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宣布起义。起义通电由陶峙岳领衔签署，各师旅长联名给毛泽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表示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命令。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为此，张治中十分欣喜。他后来回忆道：“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今后的新疆将永远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人民亦将永远享受祖国大家庭的和平、自由、幸福了。”因在新疆和平起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治中于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赴新疆协助彭德怀工作。1949年11月中旬，中央正式决定派张治中到新疆工作，做彭德怀的副手，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临行前，毛泽东在丰泽园为张治中设宴饯行，陪宴的有周恩来等。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治中说：“希望你

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张治中回答说：“主席，现在是您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您认为我有去西北的必要，我一定做好彭老总的顾问。”毛泽东说：“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最高的领导了，现在派你到新疆去，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张治中回答：“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主席、总理，请您们放心。”

宴后，周恩来又送张治中回家，在张治家中与他进行了长谈，并告诉他，此次去西北，政务院已安排好了专机飞兰州，周恩来将亲自到机场送行。

彭德怀对张治中的到来很重视，在他的带领下，贺龙、习仲勋和即将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方面的全体高级将领停下正在召开的会议，全体出动到兰州机场迎接。稍事休整，与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同志见面交谈后，张治中就陪彭德怀于当日飞往新疆首府迪化，随行的还有将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贾拓夫。

一路上，张治中总结了历史上治疆的得失以及自己过去几年在新疆的工作，对彭德怀

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历任的新疆地方长官搞得都不太好，民族矛盾激化，形成了新疆各族对汉人较深的敌视。从1945年到1949年间，特别是1946年到1948年，这3年新疆局面是如此紧张，人民心理是如此动荡。多少次濒于决裂，濒于战争，真使人惊心动魄，寝食不安。1946年来新疆时我就表示过，首先要纠正历史错误，偿还历史罪债，并和三区临时革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采取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亲苏的政策，但许多事情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彭德怀肯定了张治中几年来治理新疆立下的功劳，说：“你这几年在新疆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解决民族矛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当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抵达新疆后，彭德怀和张治中立即投入工作，他们于10月下旬率两个军的兵力进驻迪化，与担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碰头，交换看法。同时，与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开会商讨新疆的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之后，彭德怀主持召集各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

疆目前施政方针》。这是一份解放初期在新疆进行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写入了张治中的许多见解。

彭德怀和张治中到新疆一个多月后，新疆各项工作进入了轨道。张治中积极配合彭德怀开展工作，与习仲勋、马明方、杨明轩、马文瑞等合作得很愉快，大家坦诚相见，共同投入到筹备改组省政府、成立新政府和新疆起义部队思想教育等重大工作中。

新疆和平解放后，绝大多数起义部队能驻守防区，维持地方秩序，但是也有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在各地制造叛乱，危害各族人民，妄图破坏和平起义，保存反动势力。因此，改造旧军队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张治中积极主动地参加了这项工作。1949年12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新疆召开了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大会。会议由彭德怀主持，陶峙岳出席，由张治中向起义部队做《怎样改造》的报告。张治中在这个报告中详细说明起义部队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调中共的正确领导，跟随共产党是一条光明之路。他语重心长地向起义部队提出改造思想、转变领导方式、改

变工作作风、改变生活习惯等四项要求，希望大家不要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来改造自己、改造部队……共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张治中的这篇讲话，充满革命激情和对起义部队的殷切期望，对起义部队改造思想起了很好作用。

12月12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部分指战员、新疆起义官兵、机关干部。彭德怀在会上正式宣布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下辖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第二天，张治中向已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起义官兵作了题为《再谈怎样改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主要从参加政协会议谈起，并再次要求大家对自己的旧意识、旧思想和旧观念来一次彻底的改造，使部队真正成为人民解放军。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成立庆典上，张治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已经“进入了和平建设的大道，而开辟了远大光明的前途”。

父亲戴安澜光辉的一生（下）

□ 戴澄东

严于律己的道德品格

父亲一生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生活以身作则。他任200师师长时写了一篇游仙体文章，名字叫“自讼”，就是他对自己进行“起诉”。为什么要自讼呢？他说：“这理由很简单，一方面是为检讨过去的缺失，一方面是确定今后生活的正确途径。”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历史上很多正反面知名人物，分析他们对各自朝代兴衰的影响和对国家民族的态度，并以他们为镜子，认真剖析自己以及分析当时的各种现象，对抗战时期那些贪生怕死、纸醉金迷的现象进行强有力鞭笞，对自己思想上不该有的一闪之念进行严厉批判。他认为在当时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国难当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炎黄子孙必须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的安危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享乐，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顾，甚至卖国求荣、与



/ 1933年，戴安澜在长城抗战时任145团团长。

敌为友、认贼作父。这也是他提出自讼并进行批判的标准。这篇文章完成后，父亲不只自己看，还发给各级官长看，希望大家对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父亲说：“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忤；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忤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他提出

“做人做事的风度四条：一毁誉不闻，二宠辱不惊，三安危不动，四得失不患”。

父亲在军训时对官兵们说，军人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保国为民。他说：“我们平时训练大家所学的是杀人放火的办法，但是杀人的目的是在救人，放火的目的在于灭火。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靠军人维护，军人肩头的责任担子是十分沉重的，如果军人没有特殊的性格能担当起偌大的重担吗？”军人的特性是什么呢？父亲总结了四个字：忠、勇、勤、廉，并解释道：

忠，就是忠于国家，忠于职务。挽救危急是我们的天职，我们如果放弃责任，那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勇，就是战必胜守必固，当仁不让，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表现。

勤，古话说“勤能补拙”。一个人不怕笨，只要他不懒，

抱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锲而不舍，结果必定成功。俗云“熟能生巧”，只有勤才能熟。

廉，所谓廉就是廉洁自爱，自重重人，再换句话说，就是不揽非义之财，不揽非分之权，也不拿非义之财和非分之权去引诱别人。人能廉洁则无欲则刚，处处神明泰然，无牵无挂。

对于廉，他还认真郑重地对各位官长说：“要知道物质生活是最没有法子可以满足的，如专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其结果一定是趋于下流而不能自拔。”“我们国家到了这种地步，正好比中落的世家忽然出了横事，真是一个钱要当十个钱用。我们身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军人应当如何努力？效法古今伟人洁身自爱，处处为国家民族打算，就是从个人事业讲也应该如此，且看古今中外贪污自肥的人，有几个得了好结果。”

父亲教育自己的官兵说：“国家每年耗费大量的金钱来供养军人，养他一生，还养他一家，目前虽在困难关头，薪饷折扣，然而已高出人民十倍。老百姓抱着手坐在家，谁给他一分钱？那么国家为什么对军人这样优厚呢，就因为他们



/ 1939年，戴安澜任200师师长。

在危难的时候贡献能力与生命来保护人民、捍卫国家。”1937年11月11日，父亲领取5个月薪水共1500元（大洋）后，说：“回思国家当此危急存亡之时，而身为军人，不能保土卫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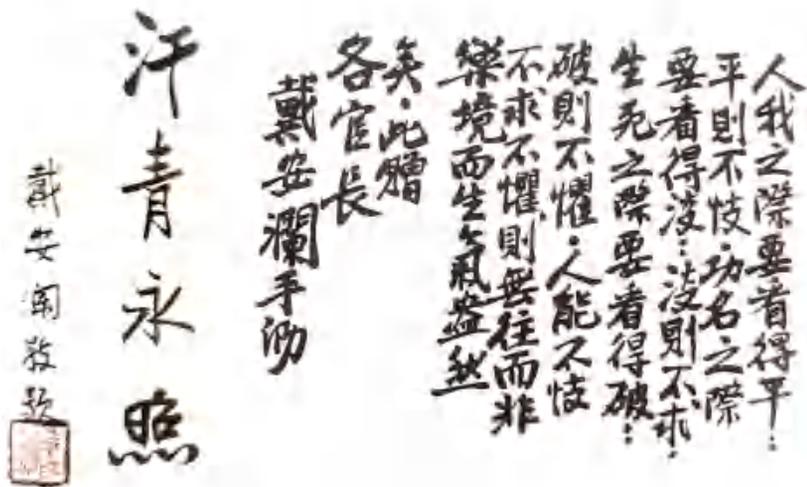
拿此巨薪，于心何忍？特提出一千元捐助国家，此作经费报效。”他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全师各官长，大家纷纷表示愿意捐款。父亲说：“一师如此，各师如仿而行之，则政府立刻可省

几百万支出也。”这种克己奉公的行为在他的一生中并不少见。

1942年初，200师陈师中缅甸边界，父亲到中缅边境的畹町视察部队时，看到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许多不法商人走私战略物资牟取暴利甚为猖獗。作为当时边境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想到的不是利用手中的职权和便利去捞取好处，而是考虑到这些不法商人的行为将破坏国内市场的稳定，从而给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故而以200师师长的名义发电报给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提出在畹町市场设置边贸局控制物资进出口及价格，以免居奇紊乱市场。电报的原稿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战斗中，父亲总是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他认为亲上第一线可以了解战况，以利指挥战斗并总结经验。

1933年长城抗战，父亲偕1位营长等4人在城墙上侦察地形，被敌人发现，敌人利用轻机关枪1挺、步枪10余支射击。父亲几人所站地方离下城的出口只有60米，但花费了一个小时仍未脱离敌人火力控制，最后4人分散行动才脱离危险。由此，他看到敌人两种枪械的配合射击法运用相当熟练，提



/ 戴安澜手迹。

出要学习轻机枪与步枪配合射击法，并对各官长说“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以对抗敌人的火力。

1942年，为了把200师从缅甸带回国，每经过一道封锁线父亲都要做好安排，如发生战斗总是亲上第一线。在经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时，遇日寇埋伏，父亲赶到第一线了解情况，不幸被日寇重机枪子弹击中胸膛，但仍然指挥突围。由于缺医无药，又逢雨季，他在经过8天的痛苦煎熬之后壮烈牺牲。牺牲前他还在地图上向参谋长周之再和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明回国路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不是如何设法派人去找医药来治好他的伤，而是

如何能使部队脱险，保留打击日寇的力量。父亲牺牲后，伍启元先生写文章称赞父亲不怕死，不爱钱，“从这一观点说戴师长确系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军人之一”。

宽严相济的带兵之道

父亲对部属和士兵十分爱护，经常和他们谈话，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生活习惯。他会要求炊事班尽可能根据大家的生活习惯安排饮食。在华北战场时，天气变冷，士兵却没有棉衣供应，只能穿着单衣，父亲带头捐款，为士兵制作棉衣。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团营连各级军官也纷纷捐款，帮

助士兵添置棉衣。在 31 集团军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时，父亲既是长官，又是教官。他和学员同吃同住，晚上查岗查哨，夜间到宿舍帮助学员盖被子，学员们深受感动。

湖南整训期间，一次攻守演习中，士兵的手和脚被作为防护工具的山柴刺伤多处，鲜血淋漓。父亲看到后，极为痛心，立即要求各部队将演习场上的山柴头部做成钝形，以免刺伤士兵。如果不执行命令，受伤士兵的所有医药费由士兵所在部队的连排长负担。

父亲还很注重提升官兵的综合素养。任 73 旅旅长时，父亲在《二十七年元旦日告官兵同志书》中要求官兵建立紧张的生活形态。他说：“自今以后，吾人必须过合理生活，规律生活，养成火辣辣之精神，活泼泼之身体，以挽救国家，以转移社会风气。”父亲还为各个连队置办笔墨纸张，置办锣鼓器具，在部队中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晚会上，他与战士们一起高唱抗日歌曲。

在处理士兵违纪问题上，父亲十分宽厚公正。在一次审讯士兵殴打长官案时，该士兵所在营的长官多次要求将士兵枪毙。父亲就对他们说，这个

士兵是犯了法，但是如果不问清原委，也不管案情的轻重，动辄以枪毙处置，实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父亲进一步对他们说，对这种问题的纠正办法，唯有养成守法遵纪观念，上下相维，行动便不会越轨。

父亲特别注重官兵的思想教育，教育形式灵活多样。他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士兵进行教育。他还把思想教育内嵌在行军路上。当部队行军经过汤阴和内邱时，他带领大家拜谒岳武穆庙和汉光武庙，号召大家传承岳飞报国精神，缅怀光武中兴大业；经过西陵和洛阳，遥见汉武帝墓、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石碑以及宋太祖陵寝，他便通过回顾历史激发大家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在训练和学习中，父亲对部属和士兵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军官大队从河南向湖南转移，长距离徒步跋涉十分艰苦，有两名学员瞒着队部，以“军事第一”为名，私自征用民船，并偷偷鼓励其他学员搭船。民船航行到武汉，他们却分文不付，下船后扬长而去。父亲接到船主举报并查实这一情况后，宣布将那两名学员送军法处惩处，同时又组织学习讨论，让学员们认识到这种违反军纪、

骚扰民众的行为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父亲用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双脚若离开地面，则所有的力量就要丧失的故事教育学员。他说：“军队和民众的关系，恰如巨人和土地的关系，军队离开了民众就一定要垮台，你们现在是学员，但不久就要成为长官，长官如此，兵又怎能带好？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啊！”此番话使大家深受教育。部队到达湖南后，那两名学员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有悔改表现，父亲看到这一情况，考虑到抗战需要人才，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后，把他们派到部队去经受战火考验。这一事件的处理，给军官大队的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由衷地感谢父亲对他们的教育和真诚爱护。

爱妻护子的优良家风

父亲对家人情感极深。母亲王荷馨原是无为县昆山乡目不识丁的乡下女子。他们的婚姻是由双方父亲定下的娃娃亲，所以二人结婚前并未见过面。1927年1月5日，在叔祖父戴瑞甫的安排下，他们在广州结为夫妻。婚后，父亲为还没有名字的母亲取名荷心，意思是



/ 戴安澜、王荷馨与子女合影。

军人妻子的生活是含辛茹苦的，其味如莲子之心。父亲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也教母亲识字。一年后，母亲文盲的帽子被摘除了，他十分高兴，又给母亲改名为荷馨，意思是荷花已发出了馨香。在家里，父亲对母亲爱护、信任、尊重，并把家中一切事务交由母亲管理。1940年1月5日，父亲指挥战斗之余，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余结婚纪念日，亦为应任200师师长职一年纪念”。

父亲在缅甸战场上写给母亲的遗书中除了表明为国战死的决心，同时鼓励母亲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并托付母亲抚养老人、教育儿女，充分表达了

对母亲无限的爱和信任。母亲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把家中安排得妥妥帖帖。抗战胜利后，母亲克服种种困难，历尽艰辛，将全家人从贵阳花溪迁回安徽老家，父亲灵柩下葬在芜湖小赭山。南京解放前夕，徐庭瑤将军奉命到我家，要母亲带领孩子们去台湾。母亲对他说：“我丈夫葬在哪里，我就要带着孩子守在哪里。”母亲深明大义，父亲牺牲后，第5军为了纪念父亲，决定建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以实现父亲生前培养人才建校强国的愿望。1943年4月1日，在纪念父亲殉国的全国纪念大会后，即举行学校开工典礼。母亲听说学校缺

少校舍办公用房资金，便将特别抚恤金20万法币捐赠出来。

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他对我们说：“父亲好比太阳，母亲好比月亮。太阳因光线的辐射，其真面目虽不易观测清楚，但其温暖之心，则所照临之处，靡不沾其恩惠。父亲因人事纠缠，对家庭态度，偶亦失真之处，但其内心，则如太阳一样公正而慈惠也。母亲则好比月亮，月光灿烂，和蔼可亲，其始终之面目，任人辨认，母爱之伟大，就在于此。”

大哥覆东小时候在湖南辰溪病重时，父母守候在身边，父亲甚至愿以自己生病求得大哥的康复。姐姐藩篱在父亲率军远征缅甸时，提出要买皮鞋。父亲一直不忘自己的承诺，在家信中解释说他那里是战场，没有市场，答应打完仗以后回来一定给姐姐买皮鞋。

但是父亲对我们的爱不是溺爱，他希望我们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人，因此，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写信教育大哥覆东要锻炼好身体，要学习好功课。大哥住校时，父亲与母亲一起去看他，父亲指出他的被子没有按规矩叠好，大哥回答说，今天是星期天，不检查。父亲立即指出大哥这



/ 戴安澜将军牺牲的地方，缅甸茅邦村茅邦竹庙。

样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按规矩办事。同时，他又表扬大哥自己洗衣服，使得大哥既感到羞愧，又感到高兴。这些点滴小事，都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父亲率军驻全州时，全家住在一起，他命令卫兵不许称我们为“少爷”“小姐”，要直呼我们的名字，也不让我们乘坐他的汽车，以免沾染官宦子弟的习气。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让父亲从小种下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繁荣不懈奋斗的种子；黄埔军校爱国革命、团结奉献的黄埔精神哺育他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一位普通而伟大的人物。

普通就在于他与常人一样，有血有肉、情感丰富，有着常人之所想、所爱。伟大就在于他有理想、明大义，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心，并能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在实践中不断进取，不断前进。直至在缅甸同古孤军与日寇激战时，父亲还写下“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父亲牺牲后，周恩来总理题写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1956年10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给我家颁发了毛主席签名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2009年10月，父亲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96年8月，父亲的墓被列为芜湖



/ 周恩来赠送的挽联。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10月7日，国务院公布父亲的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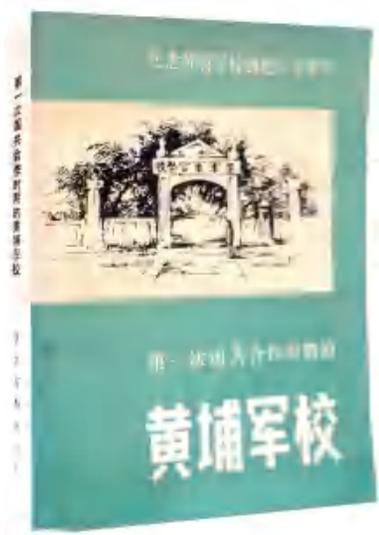
父亲如果地下有知，看到国家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定会含笑九泉。（本文由戴覆东、戴藩篱、戴靖东、戴澄东提供资料，戴澄东执笔）

回忆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 党德信

1984年6月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前后，我参加了一些有关工作和活动。如今黄埔军校建校已整整100周年了，我翻阅家里书架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人民政协大事记》《人民政协报》《中国日报》及《瞭望》周刊等书报杂志，想起当年曾参加的工作、一些活动和有关记载，十分激动。我是《黄埔》杂志的热心读者，在重读并整理过去的书报杂志时，撰写此稿，以纪念黄埔军校建校百年及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供校友和各界读者参考。

40年后回想筹划编辑出版黄埔军校回忆史料专辑，实际上从198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我主要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的征集编辑和专题整理研究工作，兼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室的联系之责。报界名人徐盈先生（曾是《大公报》著名记者、采访部主任，办报专家，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曾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政协报》编委）已年过70，1978年落实政策后，每天上午步行两三公里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上班审稿组稿（当时重点负责工商经济方面史料）。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非常平易近人，年轻干部经常向他请教。他的办公桌和我们一样，八九个人一个大屋。1982年12月的一天与我谈起文史资料征集编辑出版选题设想

时，我觉得黄埔军校专题史料价值、政治意义和影响都很大，可否提前考虑，继续做挖掘补充资料工作。徐老对这一设想予以肯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我将此情况告知经常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办公室审阅资料的黄埔毕业生文强、董益三、陈子坚和陈树华，恰好黄埔2期毕业的覃异之也来专员室，几位黄埔军校出身的老人（都是军事组成员，覃异之是军事组副组长）都十分赞同编辑出版黄埔军校专书。在向军事组和文史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后，即列入1983年工作计划，开始征稿和筹备有关事宜。

赴广东黄埔军校专题考察筹备出书并编写简报

1983年1月，政协（主席邓小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筹备换届，6月，政协（主席邓颖超）第六届全国委员会成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编辑出版关于黄埔军校的史料专书工作规划，年初曾向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报告，说

明《文史资料选辑》当时还是内部发行，仅刊发过几篇关于黄埔军校的文章，1978年恢复工作后，又征集到一些关于回忆黄埔的稿件，如加以筛选，并拾遗补缺，向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侨居海外的早期黄埔军校毕业同学继续征集一些回忆资料，编辑出版一本公开发行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专题回忆录，以配合将于1984年6月召开的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纪念会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这将对我国近现代史研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产生积极影响。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副秘书长杨拯民同意，并请中央统战部审定。1983年2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批示同意后，文史办公室即启动该书的专题征集整理研究和出版筹备工作。

11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调研考察组完成江西的专题调研任务后从赣南瑞金继续南行，赴广东调研考察黄埔军校专题。调研组由军事组组长刘琦（1932年初参加红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带队，军事



1983年11月25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黄埔军校史料考察组在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左四起：邱行湘、刘琦、覃异之、宋瑞珂、丁身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德信。

组副组长覃异之（全国政协委员，黄埔2期，曾参加香港起义）、宋瑞珂（上海市政协委员，黄埔3期）、邱行湘（江苏省政协委员，黄埔5期）参加，我在调研考察组做具体工作。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过去有关黄埔军校的资料很不完整而且不够实事求是，甚至连一本黄埔军校同学录也找不到。调研考察组在广东省梅县（现梅州市）公安局资料中发现了有关黄埔军校和东征的资料。其中有周恩来率队东征到梅县的资料和周恩来与商会的合影照片，出人意料的是发现了一本保存较为完好的黄埔军校同学录，真是如获至宝。紧接着，我们又从兴宁机场飞往广州。在广东省

政协协助下，在革命博物馆查找收集到一些资料后，11月25日即到黄埔长洲岛考察。

调研中我们发现，黄埔军校旧址的文物保护和开放参观存在一些问题，建议抓紧解决。

一、黄埔军校旧址所在黄埔岛已成为海军某部驻地和造船厂，黄埔军校旧址只保留校门（“陆军军官学校”六字还在）和孙中山先生住过的两层小楼（黄埔军校陈列馆设于此楼内），另外还有东征烈士墓和1935年建的孙中山纪念碑。由于文物陈列馆及旧址均在海军某部驻地内，而陈列馆讲解员又是海军一位干部兼任，前往参观需与海军基地联系批准并过重重关卡，甚为不便。因此，建议陈

列馆由广东省文物部门管理并派专人负责，与海军有关部门协商，在保守军事秘密的情况下，划定适当区域开放，供各界人士参观，东征烈士墓也应照此办理，允许群众自由前往瞻仰。

二、原军校校门和东征烈士墓均已陈旧，亟待维修，特别是东征烈士墓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破坏。明年（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日，为表示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黄埔军校的纪念，将有很多国内外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前往参观并瞻仰孙中山纪念碑和东征烈士墓，对文物加强保护和重点维修意义重大，有助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拨专款维修，维修任务须在明年（1984年）6月16日以前完成为宜。

三、广东省政协、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针对上述问题曾多次要求尽快解决，国内外有关人士呼声也很高，原黄埔军校大门旁虽挂有一块“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

以上问题，调研考察组的几位同志回到北京后，在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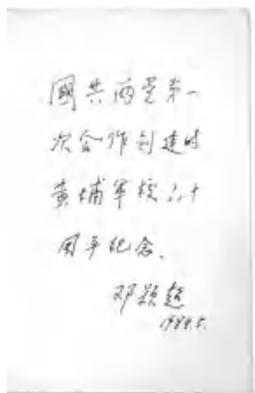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军事组全体同志（军事组成员中有十几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七八位是老红军、解放军高级将领，多为全国政协委员或常委，也有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汇报赴广东考察情况时，希望以上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在请示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陆平同意后，责成我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简报》，题为《黄埔军校旧址和文物陈列急需派专人看管、公开向社会开放并拨专款维修》，简报内容和上述三点基本相同。经军事组组长审阅、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杨成武、常务副主任张磐石（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同意后，报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批准，于1983年12月26日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名义印发简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部委，增发中央军委办公厅、海军司令部、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协。简报集中反映了军事组全体同志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有关部门的

重视。其后，又经各方面人士、文物部门和新闻单位呼吁，问题终于在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庆典之前逐步得到解决。黄埔军校旧址及相关文物旧址得到腾退、维修和对外开放，海内外各界人士参观后均表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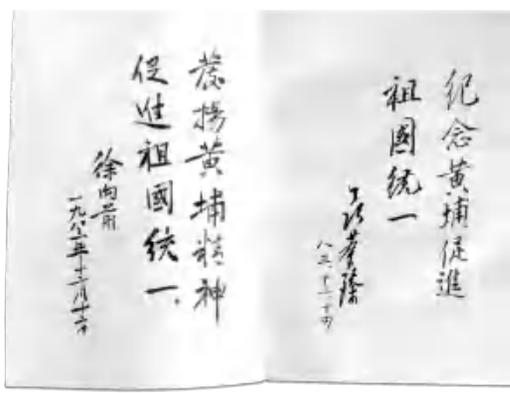
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先后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题词

由于当时图书出版还在铅字排版时代，周期一般6个月左右，所以1983年11月中旬就请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题词。很快就收到邓颖超题写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创建的黄埔军校六十周年纪念”。其后，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过的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分别题了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和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抓紧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1984年5月底出版，及时配合了全国政协纪念黄埔军校60周年系列活动。

该书作者大多是昔日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均统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邓颖超题词。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徐向前、聂荣臻题词。

称黄埔军校)的领导人、教官或各期学生,他们以自己的亲历亲闻,讴歌了母校,表达了对敬爱师长的缅怀、对黄埔军校鼎盛时期的褒扬。该书特别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中山先生1924年6月16日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转载了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1943年春撰写的文章《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刊登了中国国民党驻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方鼎英(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代校长)的《我在军校的经历》,张治中(曾任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团团、军官团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的《黄埔忆旧》,

张申府(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的《筹办黄埔军校点滴》,聂荣臻(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兼政治部秘书)的《回国参加大革命》,包惠僧(曾任陆军军官学校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的《大革命时代在黄埔》,季方(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副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的《黄埔散忆》,徐向前(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生,毕业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的《回顾黄埔军校》,李奇中(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生)的《黄埔练兵》,宋希濂(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生)的《参加黄埔军校前后》,曾扩情(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生)的《黄埔同学会始末》,覃异之(陆军军官学校第

2期学生)的《回忆黄埔》,王大文(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学生)的《考入黄埔第二期的前前后后》,陈金城(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学生)的《国共合作无坚不摧》,宋瑞珂(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学生)的《往事历历》,文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4期学生)的《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何崇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4期学生)的《难忘的岁月》,方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学生)的《潮州分校片断回忆》,蔡杞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学生)的《长沙分校纪实》,吕儒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的《一九二七年的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等文章,翔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黄埔军校及各分校的亲历史。

这里特别摘录一段张申府(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90岁高龄时撰写的《筹办黄埔军校点滴》。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1923年年底结束旅欧生活回国。“到北京后,见到李大钊同志,久别重逢,分外喜悦。我向大钊同志讲了在法国、德国的工作、生活以及党组织的情况;也讲了回国途经俄国的见闻。大钊同志向我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兴奋地告诉我



/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部分黄埔军校师生在颐和园介寿堂聚会。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雍、唐生明、覃异之、侯镜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国共合作前景喜人。”“后来李大钊同志告诉我，广东形势很好，建议我去广州。”在李大钊的介绍下，1924年初张申府受聘为广东大学（1926年改称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参加陆军军官学校筹建工作，参加了招考学员的笔试、口试和复试录取等工作。4月，第1期学生陆续进校，张申府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与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等接触交往较多。张申府写道：“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他们希望我能推荐一

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我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我告诉他们，周恩来人才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够汇些路费给他。他们当即表示没有问题。4、5月间，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信谈了此事，不久他回信表示同意。8月初，周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州，其时我正在北京度假，回粤后才见到他。他显得非常高兴，认为黄埔军校大有可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1月，他接任政治部主任，以其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军校建立了

不朽的功勋。”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1921年在法国由张申府和刘清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1984年5月出版时印刷了3.3万册，成为畅销书，深受读者欢迎，所刊文章值得一读再读。

为《人民政协报》撰写社论

1984年6月初，《人民政协

报》记者何林中找到到副主编徐亦安同志的办公室（当时都在政协礼堂北侧，原顺承郡王府东跨院旧房子办公，政协报创刊年余，每周三出版），商谈纪念黄埔军校60周年报社要发表社论的事情，他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希望我来执笔起草。我说任务重大，怕写不好。他鼓励我，相信我可以完成。我推脱不开，只好从命。于是我应邀为《人民政协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6月13日第一版刊登。其中写道，“60年前，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开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局面，促进了革命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同时，创办了黄埔军校。国共两党都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到这所军校工作和学习，大批爱国青年也争相投考。在这座大熔炉里，锻炼出不少人才，成为国共两党的骨干。因为有了这批骨干，建立了革命武装，才取得东征的胜利，使得北伐战争得以胜利进军。”“黄埔军校鼎盛时期的丰功伟绩，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为人民所称颂的。令人悲痛的是，1927年，国民党内的部分人士背弃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破坏了第一次国

共合作形成的大好形势，国家、民族深深陷入在苦难之中。”“这是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时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康乐，只有在统一、安定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个道理是大家所深知的。孙中山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是至理名言。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多次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合则兴，分则衰；合则荣，分则辱；合则稳，分则乱。并多次提出统一祖国的方案和措施。海内外人士深表拥护。我们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认清大势，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为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作出应有的贡献。”“如今，当年的黄埔校友都已进入古稀之年，分住在祖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很多国家。他们都盼望看到祖国统一和富强的的大好局面；都盼望有生之年能同堂叙旧。‘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是很多黄埔校友的志愿，为此作出贡献，是对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最好的纪念。”社论的这段话，也表达了我们编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一书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人民政协大事记》记载了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纪念的系列重要活动

由全国政协研究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人民政协大事记》，较为全面地记载了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前后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系列重要活动。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项活动。

现摘录几段如下：

1984年6月1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程子华宴请部分黄埔军校校友。

1984年6月1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出席黄埔军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黄埔校友，程子华副主席主持。会上程子华、侯镜如代表黄埔校友倡议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并提出同学会领导成员名单草案和章程草案。

1984年6月16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会。出席纪念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徐向前、习仲勋、杨尚昆、许德珩、宋时轮，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程子华、杨成武、肖华、陈再道、吕正操、屈武，部分黄埔校友以及各界人士五百余人。杨静仁副主席主持纪念会，黄埔校友程子华、郑洞

国、蔡文治、李默庵、程元先后讲话，沈蕴存作书面讲话。会上宣布正式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并通过同学会章程和理事会名单。

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徐向前会长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杨尚昆、叶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程子华、杨成武、肖华、陈再道、吕正操会见黄埔校友，并合影留念。

晚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宴请黄埔校友，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出席并祝酒。

1984年6月17日，在京参加黄埔军校六十周年的黄埔校友举行座谈会。

1984年6月1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程子华等部分黄埔校友赴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1984年6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召开庆祝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会，我也被邀请到会。看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出版社名称是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改称中国文史出版社）摆在会场主席台领导和嘉宾的桌子上，并赠送给与会



《人民政协大事记》。

黄埔校友及有关人员，及时配合了纪念活动，给会议增色不少。

会后了解到，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用热气球携带该书数百册，飘至海峡对岸，以使在台湾地区的黄埔校友和各界人士看到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图书，力求达到以文促通（两岸“三通”），以文促统（祖国统一）的目的。

《中国日报》记者采访

由于国共双方军队的很多高级将领出身黄埔军校，海内外读者也是首次看到公开出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所以该书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和国外影响很大。书内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和照片，选登了军校校长蒋介石、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军校领导人的照片，引起了《中国日报》记者董礼胜的关注和兴趣。记者为此专门访问了我，并将采访文章刊登在1984年6月26日的《中国日

报》（英文版）上。1996年4月，我给《中国日报》社总编辑陈砾先生（蒋介石文胆、“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之子，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写信，请帮助复印1984年6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他很快找到，复印并译成中文寄给我。记者董礼胜（已去比利时工作）在报道中写道：“黄埔军校时期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照片本月在中国发表，这是35年来的第一次。他们刊登于在黄埔军校60周年时出版的一本新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中，其中有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和叶剑英。”“该书主编之一的党德信说：‘我想该书如实发表了当时军校领导人的照片，将会表明它更加忠实于历史，并为国内外读者所接受。’”“黄埔军校专为训练国民革命军军官而设，是由孙逸仙博士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立的。蒋介石任校长，左派国民党人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在校工作的共产党人中，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秘书聂荣臻。”“党德信说，‘这本书不仅记录了1924—27年间黄埔军校



/ 1984年6月13日《人民政协报》。



/ 1984年6月26日《中国日报》及译文。



的历史，而且记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主要军事政治斗争。”确实如此，当时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记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历史，是贯彻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鉴往知来，这有利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其后，我又应新华社《瞭望》周刊约稿，撰写了《黄埔军校拾零》一文，刊登在《瞭望》周刊1984年第25期上。

转眼40年过去了，当时调查核实史料、编审黄埔军校稿件及召开黄埔军校同学征集史

料座谈会、为报刊撰写文章、接待记者采访等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2016年2月，我参加北京众信旅行社组织的台湾旅游团，台湾导游（三十多岁，自述当过兵，在税务部门工作过，国民党党员，在旅游车上还将自己的党员证卡让我们传看）在参观阿里山的路上介绍情况，说起国民党军队和黄埔军校，两次说起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毕业。我在下车后有机会和他单独谈话时把蒋介石的军校履历做了简要说明。这件事使我感到两岸民众学习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常识十分必要。实事求是地开展历史地理常识教育和中华文化爱国传统教育尚需努力。2018年11月，我在厦门时参加金门

岛一日游，金门导游也和我上一次遇到的台湾导游一样，谈了一些黄埔出身和退役高龄官兵及其家属子女等爱国人士回祖国大陆探亲，渴望见到祖国大陆同胞亲友、期盼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故事。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和纪念馆对外开放40年来，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数不胜数。大家都对孙中山先生和黄埔精神充满景仰，对祖国统一富强、繁荣昌盛充满信心和期望，都愿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由黄埔军校《政治学概论讲义》 谈何遂对黄埔校园建设的贡献

□ 单补生

黄埔军校在祖国大陆从1924年建校至1950年春结束，本校先后在广州、南京、成都三地办学26年，计办正则23期，本分各校毕业生达数十万人。其间校名几易，1至3期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4至5期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6期南京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总队），广州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第2总队），7期南京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总队），广州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第2总队）。8至20期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21至23期为陆军军官学校。收藏研究者非常重视黄埔文物之冠名，不可只知其一，不晓其二，它是考量文献年代及经济价值的准星。

潘家园每举办旧书交易会，都会吸引全国各地书商、旧书爱好者、藏家涌向这里打卡，来来往往的淘书人穿梭于各个书摊之间，各行其事，不时传出有黄埔军校书籍现身的消息。那次笔者淘到了一本《政治学



/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之《政治学概论讲义》。



/ 少校政治教官钟盛麟。

概论讲义》，封面隶书题名为编者钟盛麟，平装铅印，32开104页，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政治讲义之五。因此书校名只有黄埔6期独称，少见鲜知，故以佐证藏之。

黄埔史料记载：“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系黄埔第6期（第2总队）之冠名，学生自1926年10月入学，因校务停顿，延至1929年2月24日毕业，计718名。1928年5月15日，第6期学生奉第8路总指挥部转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命令，改本校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代校务何遂主持，各部处职员俱有变更，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处，以戴传贤为主任，副主任陈达材，7月3日委王名烈为政治主任教官，政治教官有钟盛麟、邓长虹、罗奇才、余祖明、翟宗心、崔志德、顾德启、张绍琨、丁济民、罗际康、吴今、任一宇等。

《政治学概论讲义》编者为首校政治教官钟盛麟（1904—1984）。

钟盛麟别号季蔚，梅县白宫镇住子顶人。祖辈三代皆为清代秀才，其自幼受家庭熏陶，好学上进。梅州中学高中毕业后，就任鲤溪小学校长，后任教西阳中学。其父钟天佑知其有志求学，便出让部分土地，供其入上海政治大学深造，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明治大学读书。学成归来，历任黄埔军校第6期少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3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中国国民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代表、湖南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兼党政训练班少将主任、湖南省军管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国民党黔桂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广东省民政厅任秘书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美援救济总署汕头物资配售处处长、广东省政府第10届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举家迁香港，定居元朗。改革开放之初，捐资家乡白宫中学建校。1984年病逝，终年81岁。

何遂大兴黄埔校园建设

何遂（1888—1968），字叙甫，福建福州人，中国同盟会会员，陆军大学2期毕业，从政同知己李济深共进退。

黄埔本校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间，因“清党”等原因，校务陷于停顿。当时，校内



/ 何遂。

建筑亦遭破坏，继因经费减缩，导致预定计划，如建筑中山公园、仲恺公园、中正公园等工程均半途停顿。

1928年5月2日，何遂就任代校务后，即着手启动校园修复、立碑建坊工作，并亲自撰写碑文，记载黄埔军校师生功绩、传扬中山总理遗愿与精神。

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何遂以本校经费虽然较前减缩，而最高长官如蒋校长、李副校长、戴传贤主任及何代校务本人，均不领受薪金，拟将应得薪饷全数捐出，并约同各部处主官就前决定，应行修建各地详细查勘，又议决将本年5月半月薪金942元，6月全月薪金1888元5角，共计2830余元，作为修建基金；其后以6个月计算，超过12000元，前后共计

14000余元。除修筑中山公园、仲恺公园、中正公园及蒋校长纪勋碑外，并建造总理纪念碑与阵亡烈士纪念碑。此外，又刻题名碑十数座，将本校建校以来官佐员生姓名刊之于石，立于本校中山公园纪念碑之下，以垂久远而示勉励。1929年3月，本校以中山、中正、仲恺各公园成立未久，园林疏缺，为求点缀风光起见，特向中山大学农科请其酌发各种树苗，以供树植嗣接。该校函允，遂派员前往搬运，于是各园随地种植，增添景色不少。

何遂自1928年5月主持校务，至1929年5月晋京辞职，短短一年间，除尽职力行教育外，同时大兴黄埔校园建设，多项建筑均载入军校史册。

一、孙总理纪念碑

本校为永远纪念孙总理起见，何遂自代理校务始，就提议由校中各主官捐廉，建筑孙总理纪念碑，全校师生闻之踊跃捐资。1928年9月，即派人选定中山公园后之八卦山顶为建筑地址，细密设计完竣之后，即由经理处招商包建，到校投标厂商共10家，结果均超出经理处最低价格之外，其投标最廉者为同德工厂之18200元。遂经校中批准与该商订立合同，

从速承建。10月11日上午10时50分，何遂于纪念周礼毕后，率同全体官佐员生至八卦山，举行建筑孙总理纪念碑奠基典礼，并由何代校务躬亲破土以示隆重，不久即告落成。

这座今天仍屹立于军校旧址中央的宏伟纪念碑，座高19米，碑高40米。正面“孙总理纪念碑”六个隶书字，是胡汉民书写。碑东侧所刻总理遗训“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大字，是何遂手书。据当时何遂带在身边的三子何康回忆：“父亲是用大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饱蘸浓墨书写的。”何遂崇敬孙中山，他在北京亲历了孙总理的追悼会，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弥留之际呼唤的七个字，给他的心灵很大震动，他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写下这七个大大的。碑西侧刻着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是戴季陶的手迹。碑后面刻有篆体总理像赞：“先生之道，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世界大同；三民建国，允执阙中；况在吾校，化被春风；江流不废，终古朝宗。”纪念碑顶部所立孙中山铜像，高



1 孙总理纪念碑。

2.6米，为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这座纪念碑1930年5月完工时，何遂已辞职离校。八卦山脚留下了何遂建碑的介绍，作为今天游览者的指引。他当年所撰写的碑文记载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和业绩。

孙总理纪念碑全文：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之创立，肇始于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先生莅临训词，以“亲爱精诚”相激发，圜座观听者罔不承警效而奋气节。盖先生鉴数十年革命未能成功者，由于无纯正革命军之实力；深知救国救民，非有真能为主义而奋斗之人杰，不足完改革而宏建设。乃创军校，选军人，定军学，搜军实，学术兼修，有典有则，使知能捐生死者，必先化其气质。于是校长蒋中正，

用编党军。校长躬自督率，先平东江之陈孽，继靖杨刘之鬼蜮，既奏凯以东旋，复誓师而北伐。不数月，奠定长江，不两载，统一全国。若夫以一敌百，为革命史独造之夏夏，旷古今中外无有其匹，何一非先生精神所凝结，诂意昊天不吊，竟弃吾党而永诀。回忆濒行告别之训言，莫追音尘而凄咽。窃以先生手创民国，艰贞卓绝，党建党治，具在方略，行易知难，详诸学说。先生言之不悛，唇焦舌敝，吾党承之，莫不涕零心折。论者谓北境会盟，南讹平秩，咸推开济于党军，实则荣源乎百粤。顾以训政、宪政之大，猷端资夫良弼，而吾党所寤寐求者，继述遗言于贯彻，庶几先生积四十年之精力，可无遗憾于毫发。今兹校生六期业毕，追维吾校之肇祖，不能自己于陈述。节南山之具，瞻屹丰碑，而展谒将以诏示来者。俾知先生之遗泽与吾校之荣光，并垂无垠于块圮。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

代理校务何遂敬撰

二、修复东江阵亡烈士墓、兴建烈士纪念坊

1928年10月，何遂修复了黄埔军校东江阵亡烈士墓，并于其侧兴建东江阵亡烈士纪念坊。他亲自撰写碑文，还特地为

福建福清同乡刘尧宸写了墓碑纪念悼文。

纪念黄埔东江阵亡烈士碑文：

惠城踞山阻水，东江锁钥寄焉。叛将陈炯明，拥兵负隅，屡攻不下。先大元帅以无主义无训育之佣兵，不足有为也。于是十三年五月，令设陆军军官学校，蒋公中正长之。乘主义，施训育，桓桓肃肃，兴也勃然。十四年春，蒋公率学生九百余人，教导团两团会各师，东讨鲤湖、棉湖，战绩甚伟。是役死事同学十六人，士兵六百余人。旋挫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班师归校，复加训练。十月再命东征，校长蒋公为总指挥，率三纵队。副校长李公济深、教育长何公应钦、程公潜分领之。各纵队基干，则本校学生三千人也。十三日令总攻击，炮射惠城，皆中要隘。敌以机关枪扫射，先锋迫城者，死伤枕藉。第四团长刘尧宸中将竟中弹亡，士气抱痛愈奋。十四日炮向北门及左右侧防，机关猛烈扫击，掩护冲锋者前进。众乘势倚梯肉搏以登，前仆后继，而飞鹅岭纵队同时夹攻。至是敌势不支，纷纷东遁，而海丰、陆丰、河源、紫金、老隆，凡入潮梅要冲，次第



/ 东江阵亡烈士墓。

悉平。是役死事同学五十八人，士兵百七十八人。古所称天险惠城，三年攻之，不足一日，陷之有余。昔何其难，今何其易欤？曰：有主义，有训育，故能果于克敌。逾年越岭入赣，转战两湖三江，铲除军阀，直捣幽燕。国基南奠，中外翕然。完成革命之功，其兆于斯乎！夫不有党军，何以展党力？不申东讨，何以勅北征？烈士之荣光，吾校之荣光也！遂命春来粤，蒋、李二公倥偬马策，以校务委代。巡视埔岛，爰至平冈之原，肃然曰：烈矣诸君，为主义死，为统一先死，死且不朽，曾何恤身后之表扬。但吾人既安其窀穸，而未彰其姓氏功绩，于义有关，乃述综概，次名籍，俾后人得证考而仰止焉。平冈之阳，松柏丸丸，碧血黄花，并堪千古矣！慨叹不

足，从而缘之辞。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
代理校务闽人何遂撰文并书

纪念阵亡陆军中将刘君尧宸碑文：

民国十三年，大元帅孙公创学校于黄埔，训练党军，蒋公中正任校长，遴选教才，适刘君自闽来充教官，训迪有方，蒋公深器之。十四年春，蒋公誓师东江，克淡水，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援第一团之困，夺敌阵地，擢升团附，六月班师，以平杨希闵、刘震寰叛兵功，擢任第四团团附。十月再发东江，君挺身任攻惠城西北门，简精卒为攻城队，挟梯冲锋。正肉搏间，敌以机关枪扫射，如雨雹，君声厉振臂，飞弹中肋下，出膀胱，血不

止而气绝矣！呜歔！君以一身博一城，君殉之明日，而城下，众皆谓英灵所凭，力破天堑，北伐奏功，实基于此，党军之威日震，军校之誉日彰，君为不死矣！政府追怀悼情，赠陆军中将，特恤金五千，又家属年恤金七百，同志同乡迎君柩，主葬黄埔烈士坟场。

君讳尧宸，字俊辉，闽福清县人，世居霞浦。祖长泰海坛副将，遂家福清。父培芬，庠生。君性沉毅有智略，桥南社，同盟中健才。辛亥武昌起义，闽应之，君亦授命，与有功焉！旋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回闽服务，从方君声涛、孙君良翰，措应敏捷，皆称其能。会王永泉约粤军逐闽督李厚基，君力扼洪山桥，大破之，厥后王永泉之团长杨化昭附臧致平，合闽南民军抗周荫人，君至同安马巷集旧部，推孙为师长，被任团长。臧、杨败，孙与民军总司令退保大田，适孙之旅长彭阁瑞有异志，孙杀之，彭部变，攻孙及君，及退赤水，君中道困于匪，脱身至厦门。夫人许氏方庆得男，不幸呱呱忽矣。慈母乃付嫂氏抚之，愤痛南来。极人世所难堪者。诂意年仅三十有一，竟能完大名于不朽，其才可惜，其志尤可钦也。遂与君生同里闾，昔岁与方君从事闽南，亦耳熟其为人，兹来黄埔吊君之墓，君挚友林兰生

为述当时状，有尽于心，因书诸石，用卒告闾烈之君子。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
代理校务何遂撰文并书

三、建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与济深公园

1929年年初，代校务何遂主持兴建了黄埔军校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身篆书“为民牺牲”乃何遂手书。碑座南侧为何遂撰写并书丹之碑文。东、西、北侧刻有北伐阵亡之独立1团1营营长曹渊等355位黄埔军校学生之姓名。

纪念北伐阵亡将士碑文：

於戏，吾党之策源于粤东也。秉先训，豁群蒙，莫不奋身振蹕，虓虎蹲熊，生死与共，袍泽与同。溯自丙寅七月，鞠旅驰骢，有仇必殄，无役弗从。逾岭蹶湘，平吴荆鄂，既马同而车攻。奠定南京国府，廓清北系兵戎。会三晋两河而誓师，咸惊为并世之雄。义旗分道，风从虎而云从龙。庶天心之厌乱，慰中外之喁喁。既夫浦口困窞者，扼力凶锋；甚而武汉螫毒者，腥血殷红。君等咸眦裂肉薄，竟裹马革以完忠。於戏！幽燕直捣兮，卒殄元凶。完成北伐兮，系

尔之功。吾党抱国恤而阐先烈兮，庶几默慰于尔衷。平冈之石屹屹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厉世兮，将以垂人纪于无穷。

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廿四日
何遂并书

何遂还开辟了济深公园并撰文刻石：

民国十五年，校长蒋公中正帅师北伐。苍梧李公济深以副校长行校长事。李公性沉毅，识远大，以为学记敬业乐群，当如紫阳所解说，其于锻炼体力，修养人格，精进学业，尤致意焉。诸生咸一观听，退而自奋，相期为干城之选。黄埔之东蝴蝶冈，居本校分校中枢，亦修学地，彼此观摩敬其群也。冈上多松，相络相瓦，使之息游，乐其群也。爰就形势，藉榛莽，去沮洳，蔚成一园，踞长洲之胜。昔庾数称和峤，森森如千尺松。今嘉树成阴，方诸树人树木，有合敬业乐群之旨，即以李公名名斯园。它日李公政和之暇，与诸生俛仰其间，更进博习，亲师论学取友，以至大成髦士之化。斯园之乐群其为嚆矢欤。

十八年一月何遂记

四、兴建俱乐部、中山纪念



/ 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及碑文。

馆

1928年3月10日，决议兴建俱乐部于黄埔军校之河畔，面积21600方尺，可容4000人。材料用铁筋三合土及砖柱绿瓦，价格87000元。至11月1日落成，内陈油画三幅，每幅18方尺：其一为林则徐焚烧鸦片图；其二为八国联军在津追击义和团图；其三为沙基惨案图。对于帝国主义者横暴之情景，及殉国烈士之奋勇精神，均描写如生，一望如身历其境，正面高悬孙中山遗像，先烈及党政要人照片亦陈列四壁，“俾瞻仰者有所楷模”。

1928年10月，北伐统一告成，黄埔军校为革命发祥地，其光荣伟大之历史，震古烁今，昭

著寰宇。自黄埔军校开办以来一切文件档案与旧存军需品，及先烈之遗迹，历任之成规，计划成立专馆，谨慎保存。故创立中山纪念馆，藉留纪念。

中山纪念馆道路系由德祥号商人承筑，全路用水泥筑成，而纪念馆内部，旋亦飭工粉饰一新，赶于11月7日前竣工，定于12日孙中山诞辰开幕。

五、修理游泳池、装置自来水

1928年6月15日，黄埔军校旧有之游泳池日久失修，秽物堆积，乏人清扫，以致污毁不堪，有碍卫生。学校要求副官处克日修理，清除积秽，以便学生练习游泳，并严禁学生赤体入浴，以重风纪。

军校以前无自来水，诸多不便，饮水殊欠清洁，为注意饮料卫生起见，特装设自来水管，于1928年8月7日开工，至8月17日乃克完成。于是冷热水随时皆可自由使用，师生甚感便利。

六、加辟运动场、筹建天文气象台

军校入伍生部为使学生得实地练习飞越攀登，增加运动，以养成能利用障碍物前进之技术学识起见，特在燕塘大操场西首，建筑应用之体操障碍物，包括石墙、牛栅、跳沟、竹篱四种，以资练习。1929年3月4日遂告完工。

军校又筹建天文气象台，以便预测天候，拟购各种气象



/ 何遂夫妇带儿子何康在大俱乐部礼堂留影。

仪器，计温度表 3 个，气压表 3 个，风向风度表 1 个，百叶箱 1 个，并特派员赴港购置。

七、辟地黄埔公园、规划黄埔长洲新乡

军校东隅至海关之间，有广阔幽静之坪场，林木葱茏，芳草如茵，背负升旗山，前绕珠江，潮波光峦，风景宜人。校中当局为活泼革命健儿之脑力，增进其宁静致远之精神，特就其地辟为校园，复增植奇葩异卉，以资点缀，并为增革命策源地之观瞻与壮丽起见，又于园中建筑音乐亭，每当余暇之时，管弦齐奏，官生同乐，革命情绪熏陶于伟大神圣音乐之中。

军校还划出本岛平冈、洪福市、上庄、下庄一带，为建设长洲新乡区域，由政治训练处拟定大纲，呈总指挥部转咨

省政府查照备案，关于该乡各种建设由军校负责，以期造成一模范新乡，籍留革命策源地之永久纪念。

何遂代校务与同仁共同努力，在一年时间内，为黄埔军校建造了众多纪念物、基础设施等。但是，1938 年，日军飞机进攻广州时将黄埔军校校本部等建筑炸毁。孙中山旧居、孙中山纪念碑和纪念室、东征烈士墓园、军校俱乐部、游泳池、北伐纪念碑、济深公园、教思亭等幸免于难。

重建黄埔军校旧址始末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整个黄埔岛划归海军，成为军事禁区。海军在黄埔军校旧址上修建黄埔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厂，日军轰炸后幸存的建筑先后被占

用或拆除。1955 年，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何遂到访广州，向广东省委统战部提出要看一下黄埔军校旧址，由何世庸陪同前往。当年的校本部已成为一片空地，军校大门和码头荡然无存，与何遂任代校务时的景象大不相同。此后经过“文革”，军校旧址幸存建筑也遭受破坏，孙总理纪念碑侧面上方的国民党党徽，正面下方何遂撰写的碑文均被水泥覆盖，东征将士墓园及纪念碑被毁。

为了黄埔军校旧址的修复，黄埔军校同仁、何遂的后代做出了巨大努力。1984 年 6 月 16 日，在黄埔军校成立 60 周年之际，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同月，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徐向前题写了馆名。

何遂长子何世庸 1936 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 10 期），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入抗大第 5 期学习。1949 年广州解放后，曾担任两广盐务局局长、广东省石化厅厅长。他与左洪涛（黄埔 6 期，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杨应彬（黄埔 17 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等校友一起，在各种有

关场合呼吁重建黄埔军校旧址，供后人瞻仰。他们的呼吁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开始采取行动。1978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始重建被黄埔造船厂占用、作为家属宿舍后院的黄埔军校东征将士墓园，疏通了墓道。1984年拨款修缮，重刻记功坊之碑记。

1988年，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理事何世庸与夫人特地在修复中的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并给在北京的三弟何康写信，信中说：“黄埔军校旧址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是其中保护得最完整的部分。爹爹手书的碑文将与世长存！……”

1990年，何世庸接任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在担任该职务的17年间，他主持了很多次两岸黄埔同学的接待工作。如1991年，黄埔1期生邓文仪将军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参访黄埔军校旧址。为接待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参访团，军校大门重建，孙总理纪念碑也得到了必要的维修。凡台湾黄埔同学访穗，晋谒黄埔军校旧址是首要行程，何世庸趁此机会进一步推进黄埔军校旧址重建事业。

从1992年起，何世庸为进一步推进黄埔军校旧址重建，多次起草报告和发表文章呼吁。

1994年，约同何康参访黄埔军校旧址，两兄弟商定联手自上而下推进军校旧址重建工作。1996年，何世庸以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义起草了一份报告，通过何康上报，请求中央主管部门、全国政协领导关注并支持黄埔军校旧址重建工作。报告还附上了广州市政府关于修复黄埔军校旧址倡议书及实施方案。此报告经何康修改后，直接送全国政协秘书长转呈李瑞环主席。经过何遂后代与黄埔同学的不懈努力，黄埔军校旧址的保护不仅获得了政府部门的重视，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1996年11月12日，黄埔军校旧址校本部终于按“原位、原尺度、原面貌”原则，完成了重建工程。广州市政府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举行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何世庸很珍惜校本部重建落成之硕果，特意将自己在典礼致词时的留影镶上相框，摆在案头。

除校本部外的多处遗迹，包括孙中山旧居、孙总理纪念碑和纪念室、东征烈士墓园、俱乐部、游泳池、北伐纪念碑等均得到很好的管理和维护，并作为旅游景点向公众开放。

2010年，广州革命历史纪念馆在黄埔军校校本部广场增

设一面长达43米的“黄埔军校本部第1至7期教职员生”名录碑。从竖立之日起，每逢清明重阳皆有海内外黄埔后代亲属前来祭祀。

随着两岸对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研究的深入，及交通和公共设施的改善，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的游客逐年增加，去年已近三百万人次。

2024年4月，为迎接黄埔百年华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部分区域闭馆，进一步提升软硬件设施和进行主题展布陈。黄埔军校的历史建筑孙总理纪念室、孙总理纪念碑、俱乐部、游泳池、东征烈士墓园等进行全面修缮。6月，如期对外开放，让人们通过参观了解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历史，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推进祖国统一，共同为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参考资料：

- 1.《梅县文史资料 第16辑》1989年11月出版。
- 2.《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24—1934）》龙文出版社1990年12月重印。
- 3.《何遂遗踪》中国书局2009年1月第一版。
- 4.杨浪、何迪主编《何遂与黄埔军校》，2024年6月自印本。



1926年6月4日， 叶挺独立团发起涑田、黄茅铺战斗

□ 贾晓明

1926年6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在湖南攸县涑田、安仁县黄茅铺和北洋军6个团展开激战并获得胜利，于第二天攻占攸县县城。此次战斗，不仅打破了直系军阀占领湘南、威胁广东的计划，稳定了湖南的战局，更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使北伐军声威大震，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火速驰援

1926年年初，两广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革命形势好转。受革命影响的湖南人民掀起“讨吴驱赵”运动。倾向革命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率部进驻长沙，取代了依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吴佩孚以“援赵”为名，任命原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率部反攻长沙。唐生智退守衡阳，急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时请广西出



/ 叶挺独立团团旗。

兵援助。

5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派兵援助唐生智，派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先行由粤入湘。几乎与此同时，广西的李宗仁也命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8旅等部入湘。

独立团出发后，于5月底进至湖南汝城附近，击溃北洋军千余人。团长叶挺率独立团主力经过渡头司、资兴到达永兴县城时，接到唐生智告急电报。电报说：“据各方探报，敌军将于此一、二日内施行总攻击，所以特令你的一团驰往援助安仁，因为那方面我们的军力太弱。”原来，

和吴佩孚同属直系军阀系统的孙传芳，表面上表示“对湖南战事不予干涉”“只求保境安民”，背地里却派粤军陈炯明旧部谢文炳4个团及赣军唐福山部两个团，乘唐生智集中主力会同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8旅在衡山一线与叶开鑫激战之时，突然进占攸县，并准备在夺取安仁县后直扑耒阳、郴州，切断湘粤交通。此时，谢文炳部前锋已进至距唐军在安仁县城以北的攸县涑田阵地仅40里的陈家铺。而唐生智用于防守安仁的部队很少，仅有39团一个团。这个团共10个连，其中4个连驻扎在耒阳附近，只有6个连（有一半是新兵）驻扎在安仁、攸县交界地区。在前沿阵地上，39团在安仁龙市乡杨柳村的黄茅铺、攸县涑田和涑田左翼江口附近各布置了一个连防守。

叶挺看过电报后，随即命令部队主力冒雨行军，一昼夜走了100余里泥泞山路，于6月2日上午11时赶到安仁县城，受到守军39团和安仁县城各界群

众的热烈欢迎。

分兵御敌

叶挺从唐生智部 39 团团长张辅处获悉，谢文炳、唐福山部占领攸县县城后，正在攸县城南架设浮桥，准备让大部队渡过洙水河向仁安进犯。叶挺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情况，召开独立团支部干事会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会议一致认为，敌人的兵力虽多，但士气低落；而独立团革命官兵士气高昂，可以以一当十。同时，湖南工农群众有支援革命的基础，尽力团结 39 团协同作战是能够打败敌人的。会议研究决定：3 日上午以第 2 营开赴涿田；以独立团第 3 营开赴龙家湾，由第 3 营派出一个先头连驻距龙家湾 4 里远的黄茅铺，协助 39 团前线部队巩固阵地，抗击谢文炳、唐福山部的进犯；团长叶挺等待独立团第 1 营赶来汇合后，随即出发。

6 月 3 日上午，独立团第 1 营在营长曹渊（黄埔 1 期生）率领下，将广州国民政府接济唐生智部的数十万发弹药押运至湖南郴州后，赶到安仁县城和叶挺汇合。叶挺正准备率部开赴前线，39 团团团长张辅对叶挺说，唐生智派参谋詹筠松来慰问北伐先遣队，今日可到安仁，希望叶挺

再休息一天，和远道赶来的詹参谋见一次面。此时，唐生智已经宣布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 8 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叶挺考虑这是初次与友军合作，应搞好关系，不便拒绝，于是决定，第 2、第 3 营仍按原计划开赴前线，他和第 1 营、直属队留在安仁城多住一天。

午后 1 时 30 分，谢文炳部突然大举进攻涿田，其前锋部队开始与 39 团前线部队接触。但叶挺、张辅接到 39 团 2 营营长王东原的报告说，敌情并不十分紧急。叶挺因刚到该地，各方面情况不熟悉，于是询问张辅。张辅认为，涿田已有王营和独立团第 2 营两个营兵力，“如敌情吃紧时会有报告”。叶挺听后，一面命令第 2 营加强戒备，一面通知开赴龙家湾的第 3 营，如涿田有敌来犯时，可相机援助。

下午 5 时，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和团直属队及刚到达安仁的第 1 营连以上干部正在出席欢迎会，忽然接到第 3 营营长张伯黄（黄埔 1 期生）来自龙家湾的报告：该营第 8 连赴黄茅铺警戒，到达时正值敌千余人来犯，现已进入阵地，全力抵抗敌人的进攻；张伯黄已率第 7、第 9 两个连前往支援。几乎与此同时，叶挺又接

到 2 营营长贺声洋（黄埔 1 期生）报告：敌千余人向涿田阵地猛烈进攻，2 营已进入友军 39 团阵地。叶挺判断敌人已展开全面进攻，便当即向友军詹参谋、张团长表示：“敌人主力已展开全面进攻，这次战斗关系安仁得失，安仁得失又可影响衡阳得失，我必须立刻率直属队和第 1 营赶赴前方作战。”詹、张二人也觉情况紧急，立即同意独立团奔赴前线，并把 39 团在前线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叶挺。

叶挺随即在独立团团部召开了简短的党支部会议。他提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会议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保证战斗的胜利。会上，叶挺决定亲率第 1 营两个连、机枪连和武装通信队赴援龙家湾，令团参谋长周士第（黄埔 1 期生）率第 1 营第 3 连、侦察队、武装担架队赴援涿田。部队出发前，当地农民协会组织了大批熟悉道路的农民自携扁担绳索，站在独立团宿营地外等候。

3 日黄昏，叶挺和周士第分别率部从安仁出发。在当地农民

的指引和帮助下，两支援军连夜冒雨向预定地点前进。

奋勇阻击

赴援前线途中，独立团指战员不时碰到39团退下火线的官兵，叶挺为避免影响与友军的团结，下令“对友军退回后方者一律不准阻挠”。独立团指战员不但情绪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激起了更加旺盛的斗志，大家都互相督促说：“友军退下来了，我们快些上去。”

谢文炳以两个团向涑田发起进攻时，独立团第2营主力已赶到距离阵地4里的涑田墟，进入友军阵地协防。为阻止敌军从左翼进攻，第2营营长贺声洋将所部第4连部署在涑田左侧数里处，由第5、第6两连担任正面阵地的阻击。经过激战，39团第6连不敌敌军猛攻，先行退走，致使阵地多半被敌占领。接着，39团第2营也开始转移，退至距敌1000米处的左翼高地。贺声洋指挥独立团第2营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不得已将阵地移动至距离涑田400米一带的小高地，坚守待援。周士第率援军于当晚11时赶到前线后，立即投入兵力巩固现有阵地，又派武装担架队接应第2营右翼，阻止敌

军的包抄。由于此处居民稀少，独立团指战员“竟夜在风雨之下，饥寒交作，困苦异常”，但指战员斗志不减，“多要求即刻冲锋”。

与此同时，唐福山部千余人向黄茅铺发起猛攻，独立团第3营与39团第12连协同御敌。由于第12连退却，致使第3营第8连被敌军包围，战斗中，第8连3名排长和数十名战士负伤。叶挺率援军于当夜10时左右赶到龙家湾时，只听前线枪声大作，且黑夜之中分不出敌我位置，于是派第1连连长莫奇标（黄埔2期）带连队向前搜索。第1连由当地农民带路，一个山头一个山谷地寻找，终于找到第3营各部所在阵地的准确位置。

周密部署

不久，39团团团长张辅也率部由安仁赶到涑田。周士第与张辅及坚守涑田阵地的独立团第2营营长贺声洋、39团第2营营长王东原一起商议，拟于翌晨反攻。叶挺同意这一作战计划，决定从涑田、黄茅铺之间敌人接合部出击，消灭敌人于涑田、桑田地区。他命令周士第率独立团在涑田的部队，在友军的配合下于第二天凌晨4时发起攻击；第1营营长曹渊率第1营第1、第2连携苏制机枪2挺，同时向黄茅

铺正面之敌发起攻击，并与涑田的部队取得联系；第3营携粤造机枪1挺，于凌晨4时40分向黄茅铺右侧高地之敌发起攻击。叶挺本人将率侦察队、特务队亲临前线指挥，随时策应。

独立团到达攸县前夕，中共攸县党组织接到中共湖南区委指示，要求做好准备支援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率部出发后，中共攸县党支部秘密赶到涑田，在当地农民中做好了发动和组织工作，中共攸县党支部组织的300多名青年农民赶到前线运送军需物资，报告敌情地形，充任向导；更有100多人带领独立团各部于深夜从小道迂回敌后，对敌人实施夜袭骚扰，“敌阵后方枪声四起，彻夜不停”。敌人因久攻不下，又被彻夜骚扰，早已疲惫不堪，又发现“南方革命军”投入了战斗，便于4日凌晨2时以半数兵力作掩护，偷偷撤出战场。

一战成功

6月4日拂晓，独立团与39团在涑田和黄茅铺同时发起总攻。周士第以一部向涑田正面之敌进攻，以主力从涑田以东插入敌军侧后向铁丝坳攻击。战至上午7时，涑田守敌全线溃退，向攸县方向逃窜。与此同时，叶挺

以一部攻击黄茅铺正面之敌，自己则率领主力从黄茅铺以西绕至敌人侧后发起包抄。黄茅铺的赣军遭到独立团猛攻，很快败退。独立团各部夺回了涑田、黄茅铺阵地，并乘胜追击。沿途民众纷纷以茶水、米粥、甘薯慰劳部队，让指战员士气大增。叶挺与周士第两路部队于12时左右在桑田会合后，一面命令各部队打扫战场，一面命令分头追敌。独立团的先头部队在第4连连长卢德铭（黄埔2期）等人的率领下，一口气直追到攸县县城外，控制了浮桥。守敌见独立团奋勇追来，顿时恐慌万状，不等己方军队退入城中就疯狂射击。独立团先头部队见暂时无法渡河，即行停止追击。守敌稍作抵抗后军心已乱，不久便陆续向县城北面的黄土岭撤退。6月5日下午2时，独立团进占攸县。

此次战斗，独立团击溃敌人4个团，毙伤俘敌官兵400余人，缴获迫击炮数门，机枪数挺，长短枪300余支。“独立团原用粤造各种杂枪，换用缴来的汉阳造七九步枪甚多，从夺获敌人武器来武装自己队伍，官兵非常振奋。”有趣的是，谢文炳在6月4日战斗中，以为自己兵力充足，可以轻松占领仁安，在战场局势仍处于胶着状态之时，竟对

外宣布取得“大捷”，但随着第二天退出攸县，便现出原形。

独立团占领攸县后，一面加强对敌侦察警戒，一面进行训练和做群众工作。叶挺同周士第商量，将攸县南面洙水河上的浮桥拆掉，断绝后路，以表示只能向前，不能后退的决心。并通令全团：“我们前面是长沙、株洲、醴陵、萍乡，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都有基础，我们有了依靠。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必须向前打，不能向后退。”

独立团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和民心。唐生智得到独立团战报后致电叶挺：“这次战役，不仅巩固了湘东，而且稳定了战局，此皆兄之功也。”并“赠马三匹并犒金若干，以资鼓励”。

巩固胜利

独立团进驻攸县县城后，谢文炳不甘心失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进至攸县县城附近，企图伺机反攻。10日，谢团向独立团第2营阵地进犯。第2营营长贺声洋将部队分向蓝岭、仙人桥两面展开，形成伏击圈，再以小股队伍诱敌深入。敌人正向蓝岭方向攻击，不料埋伏在仙人桥的第2营第1、第2连从后包抄，顿时被打得抱头鼠窜。第2营击毙敌人甚多，夺获旗帜枪械无

数。唐生智“得此报告，甚为嘉慰，已备有专函并本身肖像，交由攸县廖新任（县长）带交叶团长，以示奖励”。叶挺还接到唐生智一个电报说：在涑田战斗中，第39团第2营营长王东原临阵退却，应按军纪处以死刑。叶挺立即给唐生智复电指出：“他（王东原）为革命效劳，后来在配合我军作战中表现较好，应允其立功赎罪。”唐生智表示同意，将王东原仍留在部队中任营长。王东原感激叶挺的救命之恩，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还常来拜会叶挺。

叶挺独立团攻克攸县时，广州国民政府尚未举行北伐誓师。原定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第12师正在收拢部队，到达北伐前线尚需时日。为避免孤军深入，独立团暂停追击，在攸县占领有利地形向北警戒，全团部队以战备姿态，开展敌前练兵和群众工作，以掩护后续部队入湘集结。独立团在攸县县城驻扎近一个月，除正常的军事训练外，官兵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革命理论，组织和发动群众搞农运，号召青年参加北伐军。“宣传队共组成50余个小分队，离城20余公里的地方，均有宣传队行踪。勤务兵、传令兵均在街头慷慨激昂讲演，颇惹人注目。”

金戈铁马笔端来

——宋瑞珂抗战诗选读

□ 蒲元 乔阳

宋瑞珂，山东青岛人，黄埔3期，毕业后留校担任第4、第5期入伍生团排长。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预备第8师副师长，第199师师长，第66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务，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不久前，笔者有幸获赠由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李攀担任责任编辑的《宋瑞珂北伐抗战回忆录》一书。该书是2012年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为庆祝首任会长宋瑞珂诞辰105周年，历时近一年编纂而成的。读罢掩卷，书中数十首反映抗战的诗篇尤其令人难忘。金戈铁马笔端来，透过这些文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铁血抗争的年代。

初战淞沪：以诗写史

1937年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后规模最大的战役——淞沪会战打响。18日，蒋介石



/ 1991年，宋瑞珂重回母校时留影。

任命陈诚（黄埔军校特别官佐、教育副官）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会战期间，宋瑞珂就任总指挥部高级参谋，参赞戎机，虽未曾亲历一线，但因身处中枢，得了俯瞰全局之便。因此，其诗涉及淞沪不少战事。

淞沪战火初燃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均不大。虹桥事件后，日军很快做出增兵的决定。日本首、陆、海、外四相会议，一致同意向上海派遣陆军，而



/ 《宋瑞珂北伐抗战回忆录》书影。

为此进行的兵员动员，规模达到80万之多（实际投入30余万）。敌军实力不断加强，中国军队各路援军也在向上海疾驰。

整个会战期间，中方投入的总兵力达70余万。万千将士共赴国难，这令宋瑞珂心潮澎湃。在一首《奉命北上抗日》的诗中，这样写道：

军歌应唱大刀曲，誓灭倭奴出榆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大小战斗无算，但罗店战斗却是一个焦点。1937年8月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制定作战计划，要求第11师团登陆后迅速进入罗店镇。不久，中国军队第18军一部冒着日机的轰炸进至罗店，发现日军正构筑工事，遂发动攻击，夺占罗店。战斗至25日晚，指挥部与罗店部队失去联络，第18军军长罗卓英判断罗店已失。蒋介石得知后亲自越级下达命令，电令第一条即为：“今晚必须恢复罗店。”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视察战场后也以报告形式向蒋介石建议，要保住上海，“目前最要害地点莫如罗店”。中国军队苦战终日、伤亡惨重，但在日陆、海、空联合进攻下，至28日，罗店终为敌军所占。



/ 罗店战斗中的中国炮兵部队。

此时，陈诚已兼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第18军属第15集团军序列。作为陈诚身边的高级参谋，宋瑞珂应当非常清楚罗店的情况。尽管阵地已失，然而在此战中殉国的第18军第67师（师长李树森，黄埔1期）第201旅旅长蔡炳炎（黄埔1期）烈士、第402团团团长李维藩（黄埔3期）烈士，以及全军健儿“三来三往”“十战十决”的战斗意志永存。宋瑞珂用激昂的笔墨写道：

三来三往力争持，十战十决扫虾夷。

淞沪风云罗店血，大书蔡李是男儿。

宝山，系淞沪地区另一处

敌我必争之地，防守宝山的是第15集团军第18军第98师（师长夏楚中，黄埔1期）第583团（团长路景荣，黄埔4期）第3营。由于力量悬殊，1937年9月6日，营长姚子青（黄埔6期）以下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铮铮誓言。2017年，影片《捍卫者》再现了这场惨烈的战斗。新浪娱乐评价：“没有手撕鬼子，没有包子炸弹，没有子弹转弯，没有裤裆藏雷……当人们习惯了用‘小学课文’的思维去看抗日，习惯了没有智商的日本军人，习惯了没有智商的固定模式，一场必输的战役的确会让观众有所顾忌。然而影片《捍卫者》，却是一部让每位国人都该知道的电影……它用最朴实的镜头，

去还原那个年代以姚子青为代表的年轻人，所迸发出来的不可估量的力量。”9月23日，笔者在影院观看了《捍卫者》，如今再读宋瑞珂的《吊宝山殉国官兵》，仍是感慨万千。

惊涛恶浪撼危城，全仗姚营抵死争。

五百健儿齐殉国，中华何止一田横。

淞沪会战中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如谢晋元（黄埔4期）、杨瑞符（黄埔6期）领导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亦是典型一例。对此，宋瑞珂有诗叹曰：

八百孤军守四行，长虹万道震华洋。

炎黄自有脊梁在，十亿哀思吊国殇。

转战徐州：以诗写捷

1938年春，宋瑞珂升任预备第8师副师长。1937年10月18日，预备第8师在湖南长沙组建，直属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改隶第71军，军长王敬久（黄埔1期）。6月，参加徐州会战。徐州会战也是一场大战役，包含序战阶段的淮河阻



/ 山东枣庄台儿庄弹孔墙遗址。（蒲元摄）

击战、鲁南反击战，会战前期的滕县保卫战、临沂阻击战、台儿庄战斗，以及会战后期的徐州突围战和豫东地区战斗等。

此役，中国军队伤亡总计10余万人，虽付出巨大代价，但亦取得了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重要胜利。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侵占大片中国土地，虽然在忻口、淞沪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但日军从未实施过战役范围的退却行动，更未承认过战斗失败。而在台儿庄，号称精锐的日军第10、第5师团在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下仓皇退逃，连大批重型武器、军需物资和士兵尸体都不得不遗弃战场，成为

“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

台儿庄大捷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以实际战例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从而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而这正是进行持久抗战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台儿庄的胜利也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当时英、美、法、苏等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台儿庄作战胜利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这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宋瑞珂满怀欣喜之情书写这场大捷：

鲁南台儿庄，徐州一屏障。

血战十昼夜，大捷日月光。

大运河畔麦青青，台儿庄上杀敌兵。

血战十日摧强敌，奠定胜利第一声。

徐州会战中不容忘记的还有临沂保卫战。当时，驻守临沂的是中国军队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番号虽大，实际兵力仅有约5个团及部分直属队共约1.3万人，装备有步枪

8000支，轻重机枪660挺，迫击炮60门，山炮4门，在杂牌军中可算中上装备。但其面对的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却可以得到飞机、重炮、坦克的支援。第3军团拼死力战，伤亡日重，不得不紧急请援。

第五战区遂急调第59军（军长张自忠）驰援临沂。张庞二人原有过节，但大敌当前，张自忠不计前嫌，以国家民族为先，亲率部队增援，并主动承担反击日军的重任。1938年3月14日，第59军各部强渡沂河，开始反攻，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刘家湖失而复得者四次，崖头失而复得三次。茶叶山一度被敌占领，旋即夺回”。仅仅3天，第59军已伤亡6000余人，第一线作战部队的营长伤亡三分之一，连、排长已全部易人。伤亡如此惨重，但第59军仍于17日夜间发动总攻，在第3军团配合下，合力将日军击退，史称临沂大捷。

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分进合击台儿庄的企图，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胜敌军奠定重要基础。宋瑞珂在反映临沂大捷的诗中，用了“痛饮黄龙”的典故，“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是岳飞一生之夙愿。宋瑞珂相信，抗

日战争也终有驱敌域外、痛饮欢庆的一天：

大战临沂密云低，栖栖倭夷子规啼。

浴血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自有期。

续战枣宜：以诗写雄

枣宜会战是宋瑞珂参加的第三场大战。是役，日军投入兵力近20万，成为武汉会战以来发动的规模最大战役。

1940年5月，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主力东渡汉水，在枣阳西南至宜城间截击敌军。已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亲至火线指挥，率部与敌激战。由于保密意识不足、能力欠缺，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台具体位置被日军侦知。16日拂晓，日军完成了对位于宜城东北地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战术包围，守军英勇抗击，并不断实施反冲击，但日军进攻部队逐渐增至5000余人，并有20多架飞机助战。张部弹尽力孤，伤亡殆尽，张自忠本人胸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终壮烈殉国。消息传出，举国同悲。宋瑞珂情难自己，提笔赋诗悼念英雄：

自忠齐鲁英雄汉，杀身成仁襄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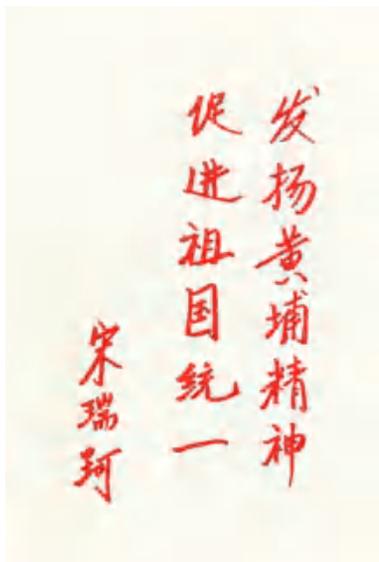
赤胆忠心报祖国，浩然正气薄云天。

枣宜会战中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还有第84军第173师师长钟毅。1940年5月7日，日军第3、第13、第39师团对枣阳构成合围之势，守军被迫转向外线。作为掩护部队的第173师对日军实施了坚决的阻击，但也因此陷入重围，与军部失去联系。9日，钟毅率部渡至唐河西岸河曲处时，突遭日军骑兵第3联队围攻。彼时，第519团尚在河东御敌，钟毅身边仅有特务连数十人，激战中，钟毅胸部中弹，难以行动，生死已在顷刻间。为不被日寇所掳，钟毅掩埋随身笔记和作战资料后，举枪自尽，壮烈成仁。宋瑞珂闻知，以悲愤之情作诗一首，向英雄致敬：

男儿抗日死沙场，青史留名姓氏香。

中原倘有英灵在，岂容倭奴逞凶狂。

尽管在枣宜会战前期作战中损失不小，但日军并未就此



/ 宋瑞珂题字。

罢手。1940年5月31日，敌西渡汉水向宜昌发动进攻。宜昌是入川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中枢重庆仅480公里，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中方对日军此举毫无预判，宜昌及周边防务空虚。6月12日，宜昌沦陷。

6月14日，宋瑞珂调任第18军第199师师长。此前，第18军在军长彭善（黄埔1期）率领下，已奉令紧急赶往宜昌阻敌。到职后，宋瑞珂在黄家大包召集团、营长等军官见面，指出宜昌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发扬我军奋勇抗战的牺牲精神，千辛万苦而不辞，枪林弹雨而不顾，把日军赶出中国，收复我国锦绣河山，完成复兴



/ 枣宜会战要图。

中华民族的光荣使命”。而后即指挥部队向宜昌城郊镇镜山、东山、大娘子岗等敌军据点实施反攻，日军负隅顽抗，第199师伤亡不小。

这一期间，日军第11军认为对宜昌的攻击已经达到沉重打击中国军队的目的，没有必要扩大占领区，遂于6月16日至17日组织撤退。中国军队遂

于17日晨收复宜昌。然而，日军统帅部认为，确保对宜昌的占领，可以给重庆更大的威胁，战略价值极大。日军参谋本部随即发出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期限暂定一个月（后改为长期）。这一命令层层传达到走在最后的敌第13师团时，该部已撤出宜昌52公里。收到命令的敌第13师团在第3师团配合

下，又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并于17日下午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重新占领了宜昌。此后一段时间，宋瑞珂率领第199师在宜昌附近与敌周旋。

1940年6月28日上午，日军进攻宋瑞珂部戍守的将军岩制高点，双方反复争夺，将军岩终被敌占。南明山一带的战斗也非常激烈，敌一再猛扑，守军顽强抗击，敌被阻于南明山南麓。29日，宋瑞珂电话通知第595团团团长章紫云，令其留一个加强营由副团长指挥，掩护团主力经小溪塔渡过黄柏河，至西岸占领阵地，但章紫云坚请由他留下指挥掩护部队。第595团主力撤往西岸过程中，日军攻势不减，章紫云率部阻击，身负重伤。渡河时，因上游大雨，突发山洪，章紫云被汹涌的河水冲走，不幸殉职。宋瑞珂对这位部下历来欣赏：“他秉性朴实，英勇果断……在他身上确实具有中国军人应有的智勇，令人敬佩。”爱将牺牲后，宋瑞珂一连写下四首小诗，以寄对英烈之哀思，其中最后一首是：

小溪塔役令人嗟，殉国英雄荡日斜。

南明山上忠魂在，黄柏河上

吐血花。

宋瑞珂深知，要想打赢残酷的抗日战争，不单单要有高级将领的身先士卒，全军将士同仇敌忾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更是取胜的基石。那些在枣宜会战中勇往直前、英勇捐躯的英雄官兵身影，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

一破二破三破残，前仆后继血未干。

虽败不馁士气壮，重整旗鼓上前线。

受降江城：以诗写胜

1943年，宋瑞珂升任第66军副军长，不久接任军长。这段时间，他先后指挥部队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并策应长衡会战。1945年，宋瑞珂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培训，7月毕业返回第66军。1945年8月，宋瑞珂在湘鄂边界的暖水街军部收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讯。回想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和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宋瑞珂感慨万千：

泱泱华夏浪滔滔，雨晦风萧起怒潮。

狂寇兵燹九一八，雄狮梦

醒卢沟桥。

军民团结御强敌，国共并肩战劲颺。

后继前仆千古血，八载艰辛万世标。

艰苦备尝十四秋，举旗策马遍神州。

枪林弹雨非所畏，忍辱负重有尽头。

中华儿女爱和平，驱除倭虜素愿酬。

应知胜利来不易，多少英雄曾血流。

8月27日，宋瑞珂收到9月10日前进驻汉口接受日军投降的电令。此时，第66军下辖第13师（师长罗贤达，长沙第三分校）、第185师（师长李仲辛，黄埔6期）及第199师（师长彭战存，黄埔4期）。行进途中因斗湖堤溃决，前进困难，被迫折向北行，后又发生船只缺乏导致渡河受阻的状况，为按时抵达指定位置，全军上下兼程急进，疲惫异常，但广大官兵均怀着胜利的喜悦而忘却长途跋涉之苦。9月10日，部队按时进至汉口近郊。11日，宋瑞珂偕副军长阮齐（黄埔2期）巡视汉口，满目皆是断垣残壁、战后余烬。目睹同胞在日

寇铁蹄蹂躏下的苦难生活，宋瑞珂不禁泪下。回程途中，田间耕作的农夫看到宋瑞珂等抗日官兵，欣喜若狂，挥舞着草帽，向宋瑞珂一行问寒问暖。看到素不相识的群众对抗日军人胜似亲人的热烈感情，宋瑞珂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思亲每泪涟，戎马匆八年。
今朝返故里，喜报乡亲前。

9月15日，入城式举行。第66军和第92军（军长侯镜如，黄埔1期）同时入城。上午8时，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宋瑞珂检阅部队并发表祝捷讲话。他着重指出，“我国军民浴血奋战2900多个日日夜夜，牺牲千百万生命，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将永垂不朽！”讲话结束，部队入城，宋瑞珂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为前导，全军将士在车后缓缓跟进，大家向夹道欢迎的江城市民含笑致意。自1938年10月武汉陷落，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苦等7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旌旗和军队，成千上万市民涌上街头迎接中国军队，人们为抗日胜利、武汉重光而

欢呼雀跃，情绪之热烈，实难尽述。

9月18日，受降仪式在汉口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受降场所内外，均由第66军战士及宪兵担任警卫，气氛庄严。下午3时受降开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副司令长官郭忏及宋瑞珂等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步入受降礼堂入座，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在堂前肃立，脱帽向孙蔚如行礼致敬。孙蔚如向冈部宣布了第六战区第一号命令，明确日军投降时应遵守的各项规定，冈部受领命令签字后表示切实遵照执行。冈部还当场解除佩刀，双手呈交，以示缴械投降。为纪念这一难忘的时刻，宋瑞珂特地作《我军武汉受降》诗：

雾散云开见碧天，弹痕错荡郭城间。

百年宿耻今朝雪，万众欢呼进武汉。

2024年系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百年风云变幻，但黄埔同学“爱国、革命”的精神始终不变。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自由独立而不懈奋斗的黄埔先辈！

黄埔精神永存！



/ 本文作者蒲元考察湖北汉口受降堂旧址。

（本文系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主题征文”获奖推荐文章）

参考资料：

1.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戴峰《血肉磨坊：淞沪会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宋瑞珂北伐抗战回忆录——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文史资料选辑（五）》，2012年版。



人文荟萃 辉映一方

——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办学地武冈

□ 黄三畅

武冈，古称都梁，地处湘西南边陲，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素有“三省通衢、黔巫要地”之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风光钟灵秀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这里还是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的办学地。

军校旧址中山堂

1938年3月，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南迁至湘西南的武冈，改名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至1945年10月，二分校招收了第14期至19期学员，毕业学员23052人，办学时间之长，

毕业学员之多，仅次于军校本部和西安七分校。

二分校旧址距武冈古城不足3公里，主要由中山堂、李明灏故居、法相岩组成，其中中山堂坐落于今武冈市二中校园内。中山堂是军校本部和12所分校中唯一保存完整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旧址建筑，2006年被评为湖南省百景之一。

中山堂是由二分校主任、著名爱国将领李明灏提议兴建的。其目的，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二为鼓舞分校师生抗战勇气。1941年3月破土动工，1943年7月建成。系中西合璧

的大庠顶外带四个攒尖顶角楼的砖木结构建筑，由正楼、左右厢房、花园等组成。正楼为三层，坐北朝南。因原基地地势南高北低，故正面只外露两层，背面为三层。建筑顶楼墙体正中嵌“中山堂”牌匾，楷书字体，笔划圆熟老到。

中山堂一楼、三楼是军士、军官的住房。二楼，也就是正面看到的一楼分为正厅和左右两侧间。正厅叫训礼堂，为纪念孙中山及祭祀英烈的场所，也是长官对违犯军纪的下属进行训诫的场所。当面墙上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大幅正面照，

照片上方悬挂着孙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牌匾，照片两侧悬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墙下置一木制长方形讲台，讲台上安一长条形讲桌，用以摆放祭品或训话的戒尺。照片对面挂有“礼义廉耻”牌匾，两侧分别悬挂总理训词、黄埔校歌、总理遗嘱等。

三楼后墙正中嵌着《中山堂记》石碑一方，记述二分校概况及中山堂修建始末。阴刻字迹有一些在“文革”中被破坏，但还能辨认出四分之三。

如今，站在中山堂前面的坪院里看去，中山堂是那样古朴、典雅、庄肃、宁静，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安闲地休憩于绿荫中。

中山堂前的坪院里有四棵古樟，皆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东南方那棵是当年黄埔学员所植，它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也在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今天。

法相岩畔石刻多

法相岩紧邻武冈市二中校园，嶙峋的石山下共有互相连通的8个岩洞，8个岩洞各有名称，洞门口都有刻于宋代的洞名。这里不说岩洞内的奇异景致，只说洞外的石刻。石刻主



法相岩摩崖石刻。

要在石山南侧的悬崖上，崖高五六米，长百余米，石刻的年代从唐代到民国历代都有。

从悬崖西头的“芙蓉洞”说起。“芙蓉洞”口左首有《金刚经》中两条偈语的石刻，是南宋宁宗时武冈军幕僚吴中于开禧三年丁卯（1207）夏至日所题，由武冈军知军钱端恕命工匠镌刻。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每个字约30厘米见方，篆中带隶，银钩铁画，自成一家。

由于明代朱家岷藩王在武冈繁衍承继了14代200多年，武冈成了湘西一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来法相岩游览、宣教

的更多。悬崖中段的“迎阳洞”左右两侧，大大小小的镌刻近20方。

洞右侧有一方很大的镌刻，正方形，边长近两米。分成两截，上半截所刻内容是“劝世文”：“思惟众苦，觉悟无常。断绝恶缘，祛除妄念……”字是篆体兼魏碑，每个字25厘米见方。下一部分是草书，密密麻麻一大版，叙述镌刻者于隆庆辛未（1571年）到法相岩游览的所见所感。

这一方镌刻的下面是一方小一点的镌刻，刻着两首诗：

谁信人间有洞天，
宝方真是不虚传，
龙蟠怪石昂头角。
蝠饮灵泉养甘年。

六月芙蓉生玉笋，

三冬花乳长金莲。
归来却忆桃源景，
因为题诗壁上联。

字体为楷书，至今仍然清晰。题记的内容是，明嘉靖三年（1524年）甲申孟夏的一天，岷藩王雪峰（第五世岷靖王朱彦汰，雪峰是他的号）来到法相岩游赏，有感而题。诗后还作了注释，说“龙蟠怪石”“蝠饮灵泉”“玉笋”“金莲”都是岩洞中的景观。

悬崖东头“花乳洞”左首的石柱上，有“碧玉簪”三个大字题刻。旁边还有“四明楼钥书，郡守姜桐立”题记，笔力清劲。楼钥是南宋孝宗至宁宗时名臣。据清代文献学家邓显鹤考证，楼钥来武冈，是因同乡姜桐相邀。

“花乳洞”内外的题刻和诗刻有30多幅。洞内的题刻“乳泉”字体为楷中带隶，苍劲清雅；“洞开”为福建晋江人、武冈州同知升署丞徐芬于崇祯元年（1633年）所书，字体楷中偏行。洞右侧又有雪峰一幅诗刻，标题为“岷藩雪峰题法相岩”，是一首七律，颈联为“百年老竹抽新笋，万古乔木挺劲茎”，落款为“正德庚辰秋之吉”。正德庚辰是1520年，先于迎阳洞边那

一幅。这一幅还作了很好的装饰。四围框了花边，上端刻了倒V形，像是把一块匾用索子挂在钉子上，无形的钉子下面还刻着花结，下面还吊着坠子。不愧是王家的制作。

“朝阳洞”内一卧石上浮雕着“谛听”。“谛听”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它虎脸，犬耳，独角，龙身，狮尾，麒麟足，能听到世间任何一处的声响。

楚南胜景乃云山

云山耸立在武冈古城南郊，属雪峰余脉，东西走向，毗连武冈、新宁、城步三市县疆界，七十一峰参差连绵，最高峰紫霄峰海拔1372.5米。1984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云山划为自然保护区；1992年7月，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以云山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云山国家森林公园；1994年，云山国家森林公园被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旅游区。1995年10月，华国锋为云山题字“楚南胜境”。

云山风光奇丽，最大特色是云幻、林丰、水秀、山奇。

云幻。常出现在雨后初晴之时，云从峡谷里升起，幻成多种形状，或龙蛇，或虎豹，或长桥，或大树……又转瞬而变，令人目不暇接。

林丰。一是云山满山披翠，保留着大片的原始次生林和人工林。二是云山树的种类繁多，南方其他地方有的树种这里都有。20世纪初，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到云山调研，发现新树种80多个，其中20多种就以云山命名，如云山白玉兰、云山钟萼木，等等。“湖南榉树王”也驻蹕云山。三是云山古树多，树龄三四百年的并不少见。

水秀。云山有无数条泉水形成的溪涧，溪涧又跌出多条瀑布，著名的有“一涛飞瀑”和“檐前流水”。瀑布下的潭水尤其清冽爽净。

山奇。一座座峰峦或磅礴或挺拔，或两两对称，或状成莲花；更有高峡悬崖，肖形的山峦、巨石，天然的石拱桥等。

云山还是宗教圣地，被道教界列为“六九福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湖南考古略》记载：秦始皇派侯生和卢生出外求长生不死之药，两人来到云山，被云山的美景迷住，就不想回去了，于是就和早在云山修炼的谭真人一起修炼，终于成仙。至今，云山还有不少侯生、卢生和谭真人的遗迹。当然，除了侯生、卢生、谭真人，还有更多方士在云山结庐炼丹。

云山也是佛教的“楚南胜地”。汉魏以来，山上就有佛教寺庵，其后香火梵音一直不断。明代，云山已成了湘西南佛教香火鼎盛之地。明清以来，有不少著名的上人、禅师在此挂锡、传道。现在，仍有不少高僧在云山宣演佛法。据说云山的菩萨也一直灵得很，有“南岳烧香，云山还愿”一说。

因为自然和人文的原因，云山跻身包括衡山、岳麓、九嶷在内的湖南“四大名山”。

中国古楹联第一村

坐落于武冈市东北面的浪石村，是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2012年10月，浪石村被中国楹联学会命名为“中国古楹联第一村”。2013年，浪石村名列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湖南省第四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

这一民居群的兴建滥觞于明初。当时，有个叫王祖清的在武冈岷藩王府为官，明洪武四年（1371年）武冈农民起义时，随岷藩王外逃，尔后漂泊无定。到了明永乐七年（1409年），王祖清的长孙王政海来到武冈州城东面百余里的李家坝。他见田畴四围山峦起伏有如波浪，山上又多卧石，想到自己一家也

不应再漂泊，应像浪中的石头一样沉稳下来。于是，将李家坝改名为浪石。从此以后，王家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生息，薪火相传。

耕读传家是王祖清的遗训，浪石王氏的后代铭记心底。既耕且读，王家的后代子孙中出了许多能人、富人，清末至民国初年，大地主就出了48户，几十里、几百里外都有他们的田庄，而大本营浪石村的房屋也越建越多。王家从明代初叶至民国初期的房子，至今仍保留着88座，保存完整的有55座。

这些房子依坡叠级而筑，布局规范、严谨。每排房子以封火山墙相夹的青石板小巷相隔。小巷窄的不足1米，宽的也只有1.5米，彰显着中国农民节俭质朴的本色。

住房均为砖木结构的四排三间平房。正中一间为堂屋，堂屋有三副即六扇两两相对的大门——平素只开中间的一副，左右两副有红白喜事才开。每扇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其实是窗，叫门窗，窗内镶着窗棂，窗棂间饰有花卉虫鸟；下部先是一个长方形框子，框子内是雕刻，再下面就是木板。一间堂屋有三副大门，也就有六个

长方形的框。框内有雕刻，内容或是飞禽走兽，或是奇花异草，或是民间故事，如桃园结义、李逵负荆、辕门斩子。雕刻工艺极为精湛，既有浮雕又有透雕，立体感很强。

每座房子均有左右两座搭着牌楼的角门（侧门）与小巷相通，角门最能体现浪石古民居文化特色。

角门牌楼最上面是一段拱弧飞檐，拱弧下面横一块厚门枋——或木枋或石枋；拱弧和门枋之间封上砖，叫门额，门额上刷着桐油糯米石灰浆，再塑上花卉图案。横枋如果是木枋，上面则突出两个雕花的门当。门当有讲究，房主人的地位不同，门当的样式和花型也不同。所谓“门当户对”就出于此。

门枋下面，两头各安放一块石门衬。石门衬外端是长方体，内端是龙头形状。两个门衬下面分别是一块厚大的石门框，上部顶在石门衬的长方体部分，下部座在石门墩上。石门墩是长方体，有一截是凸到巷子里来的，这一截是正方体，边长约一尺，其正面和内侧的竖壁有浮雕，或仙鹤、或灵羊、或金鱼、或牡丹，又以一种近似麒麟的“避邪兽”居多。夏秋季节，人们可以坐在石门墩上

乘凉。两个石门墩之间横着石门槛，一般高一尺，正面多刻双龙护宅图。

最值得一说的还是石门框，皆由整方青石砌成，靠巷道的一面均有阴刻楹联，周边饰着花卉图案。这种楹联整个民居群还有 50 余副，内容可谓联联有意味，字体则包括楷书、隶书、行书等，风格各异。均为历代族里文人所撰，有些还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手迹。

下面是一些楹联的内容：

齐家治国平天下
尽孝竭忠处世间

往来若乾坤旋地
出入如日月经天

碧水环门龙起舞
丹山绕石凤飞鸣

三珠玉树门前绕
五子经书室内香

放眼相关天下事
入门且喜一家春

山林忧乐先天下
衡泌栖迟味道根

浪静水清行龙卧

石奇风香藏虎踞

廉泉让水高人宅；
种柳栽桃学士门。

关于“廉泉让水”一副，还有这样的传说。这一家自明朝中叶以来就代代有人做官。明末的一年，为了一桩案子，有人拿了重金贿赂出自这一家的州官。州官念出老家的楹联，然后说，“高人宅”“学士门”出来的人，会贪赃枉法吗？那人不不甘心，又到他的老家，要把重金送给他辞职在家的老父亲。老父亲说：“你糊涂啊，进我家来，不读门联！‘高人宅’‘学士门’的人，会贪赃枉法吗？”这“高人宅”“学士门”的清廉，一直延续下来，被誉为“廉政世家”。

欲寻美食来武冈

武冈美食异彩纷呈，武冈卤菜、武冈血浆鸭、武冈铜鹅、武冈米粉……皆有独特的风味，而福饼、发糕、绿豆饼、葱花饼、蕨粑粉、米豆腐、爆米糖、柚子糖、烤红薯等等，也都是让人满口生津的美食。

武冈卤菜种类很多，主要有卤豆腐、卤猪血丸子、卤铜鹅（产于当地的一种优良品种

鹅）、卤牛杂猪杂、卤蛋等。既可作家常休闲小吃，又可作大宴席上的重头菜。2007 年元月，武冈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卤菜之都”。

武冈卤菜总的特点是油光发亮，香气醇厚，多种味道融合，鲜味尤为独特，令人回味无穷。但不同的卤菜制作公司和作坊，产品又各具特色。规模大的公司，除挖掘承继了传统配方和工艺，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产品进行改良。那些家庭作坊也不可小看，他们大都使用祖传配方，制作细节也是靠代代口传，卤菜色香味当然独特。

武冈血浆鸭闻名遐迩。血浆鸭因在炒制过程中加入鸭血酱料而得名。这道菜肴，看上去黑乌乌的，外观不抓人，甚至可能让人心生疑惑，可吃过后，看法就会大变。但觉肉味鲜美，骨头脆嫩，连那些掺和其间的肥膘肉也只是肥嫩而不油腻。鲜美中带点清新爽口的甜，也带点酸和辣。让人刻骨铭心的还有那种融合了鸭肉和各种作料的香，香得清冷，香得醇厚，香得余味无穷。做血浆鸭须武冈本地鸭，其他地方的，做起来会失了味道。

武冈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点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

□ 熊子杰

第二十章 台湾著名的屏东 鹅銮鼻灯塔是湘军率浙江人建 造的

鹅銮鼻半岛位于台湾岛的最南端，属屏东县恒春镇，地势东陡西缓，沿岸布满珊瑚礁。“鹅銮”一词为排湾语，有“帆船”之意。鹅銮鼻上的鹅銮鼻灯塔，是台湾南部一座知名的地

标建筑，是如今大陆及国外游客必去的景点。

鹅銮鼻灯塔并不是台湾人建的，而是清末一群来自湖南及浙江的湘军建造的。1881年，台湾兵备道刘璈来台前招募一群浙江台州的泥木工师傅及湖南籍兵勇，共同打造了这座灯塔。

台湾东部海岸暗礁密布，

暗流汹涌，许多外国船只不谙水流及礁岩，常常触礁发生船难，船员侥幸生还上岸后又常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遭“出草”（杀害）。外国政府与清朝交涉，清朝又多消极处理，导致外国列强借此多次兴兵侵犯台湾。牡丹社事件后，清朝认为建灯塔以减少船难是当务之急。1875年，在日军撤出屏

（接前页）

心，叫福饼，也是名声在外。传说宋开禧年间，武冈一带大旱，老百姓无食物果腹，武冈城郊法相寺上人制作了一种饼做施舍。这种饼中间是空的，只是内壁粘点糖，但看上去很厚，能给人以慰藉。上人创制这样一种饼，除了因为寺内粮食不多，要用有限的粮食制作出更多的饼以施舍更多的人，还要以此宣扬佛家“空则有，有则空”的禅意。寺庙把这种饼

施的行为叫做送福，老百姓则是接福，于是僧、俗一致称这种饼为福饼。福饼的大小像一般的月饼，一面是平的，另一面是隆起的。主要原料是面粉或五谷杂粮粉，其中的糖是麦芽糖和红糖。武冈福饼的好处是，掰开一点就有香气袭来，吃起来又香、又脆、又酥，不腻、不粘牙。麦芽糖可起到生津、养胃、助消化的作用。福饼可做零食，可做宴席上的点

心，更适合做旅行干粮，当然也是送礼的最佳选项，真正价廉物美。

武冈，这一方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土地，如今已成为一座20万人口的都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两条高速公路穿市郊而过，武冈机场航线通向八方。黄埔爱国将士未竟的理想，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相信在武冈人民的齐心建设下，武冈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东后，清廷责令刘璈兴建灯塔。刘璈受命后，即着手规划、设计及兴建工作。不过，刘璈本人对兴建灯塔有不同意见，他认为：

恒属建造灯楼一案，论其事则为善举，迹其心则怀叵测。台地物产饶沃，久为彼族垂涎。

今彼族建楼于台之极南，左顾山后（指今日屏东），右盼山前（指今日宜兰），前后交通，出没自便。非若台北之前后路梗，呼应尚难。此山后之未可疏防也。……彼素所垂涎者，不几在掌握中也？

刘璈认为李仙得积极游说施压清廷速建灯塔其中有诈，认为老美又是假借人道立场，暗藏掠夺大清江山之贼心，所以态度较为消极，多次谏言，但朝廷并未采纳，最后刘璈也不再多言。后因服丧，刘璈匆匆返乡，建灯塔一事遂搁置未动。直到他奉诏二次赴台时，亦身负建造鹅銮鼻灯塔之责，来台前招募台州工匠及岳阳兵勇数百名随之赴台，抵台后全编入“岳字营”，属刘璈嫡系部队。鹅銮鼻灯塔终于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11月开始建造，于



/ 鹅銮鼻灯塔。

1883年（光绪九年）2月建成。（《刘璈与刘铭传在台施政之研究》，郭志君，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鹅銮鼻灯塔是清廷在台湾兴建的第一座灯塔，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具备武装功能的西式灯塔。鹅銮鼻灯塔塔身以生铁铸造，高21.4米，共有6层。塔楼建筑成炮垒型，以塔楼基座为炮台，围墙上每隔3.25米设置一射击枪眼，墙外四周设1.8米深的壕沟，并派有武装士兵驻守。此塔一共花费了200多万元建造。1883年鹅銮鼻灯塔开灯启用后，对于航行于巴士海峡及台湾海峡的船只有莫大帮助，之后10年间仅有3次船难，更再未有遇难船员与台湾少数民族冲突事件发生。鹅

銮鼻灯塔对台湾南部及东部海上航行安全充分发挥了功效。

台湾《中国时报》主编陈怡真在《鹅銮鼻灯塔》一文指出，她的曾祖父就是在1881年追随刘璈来台的浙江台州人之一（刘璈在1864年署理浙江台州知府，将近10年，官声甚佳）。她指出，当时来台的台州泥木匠共有100多人，都编入刘璈嫡系部队“岳字营”，协助刘璈建造鹅銮鼻灯塔，她在文中叙述：

……光绪七年派任台湾兵备道，上任前，且于台州招募泥木匠勇一百名随带赴台。

台湾兵备道驻守台南，我太爷爷极可能在安平登陆。一抵台，他即与同伴被编入岳营，岳

营的兵来自刘璈的家乡岳阳州，是刘璈军营的心腹军。这批勇丁又拨归镇海左营，驻扎在狮头社军工厂等处。在营小作，暇则操练；操练的项目包括“刀矛枪炮以及兵阵”。所以太爷爷在台湾，还接受了军事训练。

刘璈并饬令起造鹅銮鼻、旗后、东港、扑仔脚、郡城内外演武厅各公所，那么除了在高雄屏東一带起造各式公家建筑，太爷爷还是当年建造鹅銮鼻灯塔的工匠之一。

陈怡真女士所述她太爷爷来台故事与史料记载是相吻合的。1881年（光绪七年）当时任职兰州道的刘璈受命来台担任台湾兵备道一职，为台湾实质的一把手，因为台湾巡抚为福建巡抚兼任。刘璈知道此行须负责建造鹅銮鼻灯塔及台北城，故来台前从浙江台州招募泥木工匠100多人从台州搭船到台湾，当时唯一开放与大陆通航的港口只有台南安平，所以这些台州工匠确实是从安平港登陆，也都被编入“岳字营”。“岳字营”先是驻守在台南，后又调防到高雄镇海左营，这些浙江泥木工匠除平时做工程外，还习武，参与台湾平乱

及防御工作。由于“岳字营”并未参与基隆或沪尾战役，陈怡真的太爷爷可能参与屏东平乱或是修护炮台工作，立有军功，后也应参与鹅銮鼻灯塔实际建造工作。

另一位台湾作家公孙策在《刘铭传与我的曾祖父》一文指出：

刘璈当年受命出任台湾兵备道时……出发赴任前，在绍兴招募了一批工匠。他此举是有远见的，这一批工匠在南台湾完成了很多基础建设，包括鹅銮鼻灯塔在内。我的曾祖父是做木匠的，他就是那一批军工之一，然而，我的曾祖父曾经对建设台湾做出贡献，那是一件令我非常骄傲的事情。

笔者不知陈怡真女士的太爷爷及公孙策先生的曾祖父是否是亲戚。这些浙江人、湖南人回到他们当时建造的灯塔，想到灯塔是指引外国人登岸的明灯，却没法提供自己归乡的路，西望故里，欣赏灯塔，睹物思情，无尽的大海，隔绝回家的路，心中不免生出无限感慨。这些由浙江台州来台的泥木工匠及湖南岳阳来的湘军，许多并未回到自己的故乡，最后

可能都选择留在台湾，落地生根。

鹅銮鼻灯塔建造者的后裔，如陈怡真、公孙策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缅怀他们先人为台湾的建设及防卫做出的贡献。这些从大陆无论哪一省份来到台湾的人对台湾的无私奉献，才铸成了今日台湾的富庶与繁荣，这些人才是地地道道受人尊敬的台湾人，而不是那些嘴上说爱台湾，却一天到晚专干撕裂族群、危害台湾之事的政客。

鹅銮鼻灯塔是台湾八景之一，是台湾颇具代表性的景观建筑，也是著名地标之一。可是绝大部分大陆同胞甚至许多台湾同胞却不知道这著名地标是湘军刘璈率湖南兵勇、浙江泥木工匠们齐心建造的。■

更正说明

本刊2024年第2期《黄埔师生浴血太行》（上）一文中，第66页“17日，从龙山（今辽宁朝阳市）出发。”中的“龙山”并非辽宁朝阳市的龙山，而是汉城龙山。特此更正，并为给读者造成不便表示歉意。